

医路历程



东南大学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南大学医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东南大学医学院退休教工党支部
东南大学医学院团委、学生会

东南大学医学院王世浚教授100寿辰春节慰问会纪念



医路历程

东南大学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南大学医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东南大学医学院退休教工党支部
东南大学医学院团委、学生会

2019年10月19日

卷首语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伟大祖国70年来的繁荣进步，是党带领亿万人民用自己聪明才智与勤劳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艰苦奋斗、接力拼搏缔造的。纵观东南大学医学院84年的发展成就，也是与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由一代代筚路蓝缕，挥洒汗水创造的。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日子里，为了大力弘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大力宣传老一辈的奋斗事迹，我院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利用与退休教工党支部结对共建的平台为抓手，在学院党委大力支持下，以及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团委有关老师指导下，生动活泼地开展了“读懂中国·90后对话‘90’后”主题党日活动。37名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满腔热情参与了该项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参与成员共分为九个小组，分别采访了遗传学王世浚、高翼之，免疫学刘功云，内科学陈雪月，外科学伍福乐、周玉篇、董意如、冷永成及中医学窦国祥等9位教授。

受访的9位老专家中，中共老党员8人；90岁及以上的长寿老人8位，最年长者王世浚教授已是102岁高龄。他们每个人及其家属均欣然热情地接待了相关采访的同学，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奋进往事、难忘经历、职业情怀以及教书育人、救死扶伤、传承创新的骄傲与豪迈，使得参访的同学普遍感到受益匪浅。

《医路历程》是集结了同学们采访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图文并茂所记述的每一位老专家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其内容具有真实性、时代性、文学性，值得一读。细细品来，老专家们的共同特点是情系医学，缘定终身。少年为富国强民追求梦想，中年为恪尽职守奋斗担当，晚年为初心使命光彩依旧。

走近医学院著名老专家，他们每一位都是有故事的奋斗者、创造者；他们每一位都是共和国成长的可敬年轮；他们每一位都是一座知识浩瀚的图书馆；他们每一位都是医学院发展史的活字典……

《医路历程》开卷有益，泽被后世、砥砺来者、薪火相传、赓续济世。

刘岐山

2019年国庆前夕 识于丁家桥

目 录

- 浅谈学者精神 李松粟, 史楠, 毛倩倩, 张可 (4)
- 坚定学医不放弃, 严谨行医报社会 张玲, 吕振港, 管佳恒, 万理林, 陈怡文 (12)
- 埋头耕耘不言悔, 醉心科研结硕果 陈怡文, 陈文雅, 王溥丰, 徐帅磊 (19)
- 金玉其质, 锦篇绣帙 杨雯迪, 顾倩, 姜添铖, 赵猛, 罗彪 (27)
- 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吉欣, 田甜, 黄淳淳, 阮亮 (36)
- 波澜多姿人生雪, 铿锵玫瑰似月明 田宇嘉, 杜天, 王文帝, 刘丽萍 (45)
- 君子之风, 医者之心 孙若语, 杨钧岚, 常婧瑶, 江雨昕, 曹鑫 (54)
- 与祖国的 90 年风雨路 李建平, 孔静庭, 曹鑫, 王家奇 (62)
- 醉心中医六十载 悬壶济世为良医 李瑞祺, 刘燚, 陈泽欣, 王家杰 (69)

浅谈学者精神

——王世浚教授访谈录

李松粟 史楠 毛倩倩 张可

在约定好时间的那个下午，我们一行四人穿过医院后面的小走廊，踏过石板路，走进掩在树旁的安静小楼，那里住着我们的采访对象——王世浚教授。

我们先来讲一讲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历史，东南大学医学院位于风景秀丽的玄武湖畔，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35年的中央大学医学院；1937年战争爆发，随大学前往成都华西坝；1946年11月，抗战胜利，随大学迁回南京；1949年5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医学院；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1月，医学院正式独立，更名为华东军区医学院；1952年3月，更名为第三军医



学院；1953年3月，更名为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随第五军医大学迁西安，成为今日第四军医大学的主要前身，留下的部分专家教授及老师与三所军队医科学校共同组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学校，1958年更名为南京铁道医学院，后者于2000年四月与东南大学合并，在2009年12月，基础医学院和临床医学院合并成为东南大学医学院。

王世浚老师194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谈起他与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关系，他说，对他而言，东南大学医学院就像是他的孩子一般，他对东南大学医学院有着非常不一般的情感。1958年，身为上海军医大学教授的他，从上海奔赴南京，与另外2名教授一起组织创办了南京铁道医学院，他说，创办南京铁道医学院是他一生里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因为南京铁道医学院的成立，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会为我国培养许许多多的临床医学以及基础研究领域

的专家。

视线回到王教授的家，轻轻敲门，我们便看见墙上挂满了他与学生们、与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合影。从上世纪的黑白照片到近些年的彩色照片，这一张张岁月长河中的照片不仅记录着王世浚老师自身的经历，同时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的岁月变迁，呈现着这个校区的点点滴滴。在向我们展示照片时，王老师特别指出了其中一张照片，那是他百岁大寿时，在校园里与他的学生一起拍的合照，当谈及这张照片时，我们看到王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像孩子一般灿烂的笑容，仿佛一瞬间回到了自己上学的时代，与同伴们一起，为我国的



医学事业不断地奋斗。

当时作为生物学家出身的他，立志要为我国的遗传学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努力与争取下，南京铁道医学院创办了一个在当时算是为数不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主要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他认为，一个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实验室，不在于其中有多少人，而在于其中有多少热爱研究、愿意踏踏实实从基础一点一点做起的学生，他在实验室里工作时，2届招生一共只招了6名学生。他对自己的学生认真负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跟随王老师做科研的这段时间里，不管是知识层面还是为人处事方面，这些学生都收获到了许多，他们都在日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杨焕明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贺林院士、美国 MD. Anderson 大学盛晓阳教授等，他们都是在医学生物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贺林院士揭开遗传病家族的百年难题，两次登上 Nature 的封面；

杨焕明院士开创中国大规模基因组测序的先河，引领科学风骚十余年。老师这一生只招收三个研究生，却个个都大有作为，王教授也因此被同行尊称为“超男研究生导师”。可以说，王世浚老师不论是为国家遗传事业的发展，还是南京铁道医学院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们走进的这间屋子，占地不是很大，家具也十分简单，静悄悄的环境，散发着一丝水果香，书籍与书法作品却是不少的，书籍占了一大面墙，书法作品也是随处可见。我们感慨，这屋子就像是老师一生的写照，看上去简单平凡，不看重金钱利益，内里摆得满满当当，盛着丰厚的知识，载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念着亲人，记着学生，面上平淡，身影高大伟岸。

在我们谈起王老师的教学经历时，他笑着说自己是“土八路教师”，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留过学，但却一直保持着一股敢拼、敢闯、敢做的研究精神。我们感受到老师骨子里面饱含着

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与期盼，他把满腔热血付诸实践，洒在了中国遗传学这片等待耕种的土地。也正是有了这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才能创办起南京铁道医学院，在科研方面，才能够不断尝试，不断探寻新的可能性，不断丰富我国有关遗传方面的研究。

随后，我们向老师提及他一生的卓越成就和他优秀的学生时，面对社会上他人的各种夸奖与称赞，老师倒不觉得是自己有多厉害，他认为关键

分谦虚地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老师心里，是学生们自身的努力及优秀，让他们钻透领悟知识，让他们在国外的会议上出人头地，为国争光；而正是因为他们的有所作为，带动了中国医学遗传学的发展，最后成就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名声。王教授相信，老师只是传道授业的人，他把知识和技能教给学生，教的只是一些基础知识或者学习的方法，而真正的修行在于学生自己对于学业研究的进取与长进，在其中，老师只起到引导



在于学生个人的努力。王世浚老师十

的作用，学业或技艺上的不懈钻研与

提高，终究还得靠学生自身的努力，多下苦功夫多练习，多反复琢磨琢磨领悟领悟，才能学得好、学得扎实。

但在我们看来，学生入门的时候也很关键，如果没有一个像王教授那么优秀的老师引导，仅靠自己琢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难悟出道理，进而成才的。教育的真功夫是“读懂学生”，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教师做学生品格锤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的引路人，老师打造好了模子，学生才能在添加美好的色彩时形成自己独特的的气质，而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谦虚优秀的引路人，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打造好自己的学生，主动把掌声与鲜花留给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的学生，背后默默为他们鼓劲支持。

古人有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王世浚教授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到74岁才退休，如今老师即使百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谈起自己学习的往事、教学的往事，在战时艰

难教学的历史，他满脸都洋溢着重返青春的笑容。村上春树说：“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有对自己不轻易放弃的人，才能活得年轻精神，随着岁月老去的只是一个人的相貌与年龄，不老的是气质与有内涵的灵魂。王教授便是这样一个人，不服老，不服命运的安排，即使年事已高，即使身体有些问题耳朵不太灵便，依然不会放弃学习的机会，他每天坚持查阅新闻、练习书法，始终保持年轻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在教授身上，我们看不出寻常老人的老气与颓废，反而浑身充满了精气神儿，满面红光。

你看，作为一名老师，即使年事已高，依旧精神抖擞，对热爱的事物充满了干劲，在学生看来，那就是耀眼的阳光，毫不犹豫地照进他们有些彷徨的心扉，又毫不犹豫地指向他们该前进的方向，看得多了听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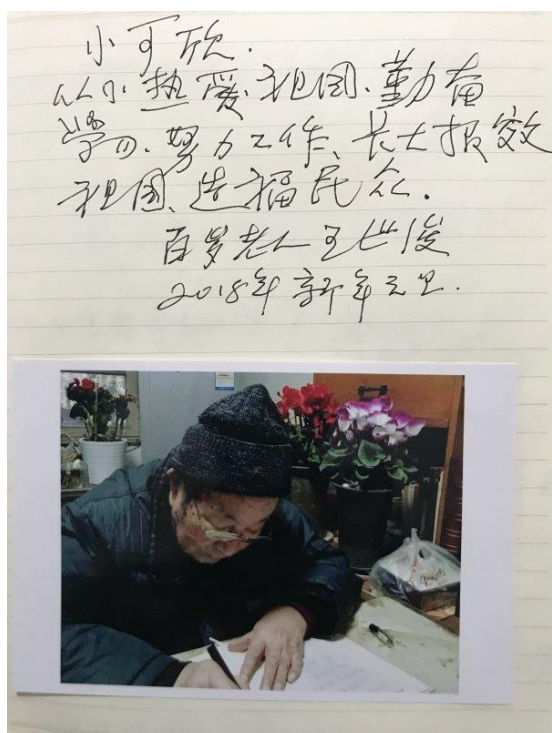
老师挺拔的身姿忙碌的背影便一点一点渗进学生们的脑海，成为他们以后就职做事的目标，行事处世的准则。

王教授说最让他骄傲的事，就是一生做学生，一生做老师。谈起往日带过的这些学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他与多名学生的旧日合照。老师被学生们簇拥在中间，每位同学的脸上都挂着骄傲的笑容。数十年过去，老师仍然清晰地记着每位学生的名字与毕业去向，给我们指这一位是谁，现在在哪里工作，那一位又是谁，当年有什么十分了不起的作为。谈起一位儿科主任，他很激动地说，“他愿意做我的学生，他对遗传学很感兴趣！”语气中充满了对自己学生、对自己教授的课程的骄傲与感动。

王世浚老师作为一名桃李满天下、献身于科研的学者，是我们年轻

一代值得学习的榜样式人物。而我们新一代青年，渴望接受老师作为过来人的知识传授，也渴望聆听长辈成功人士的经验分享。所以我们问教授作为一个老师、学者，您对我们年轻一代有什么希冀和期望时，王世浚教授非常开心，思考了小一会儿，他执笔在纸上写下：“用习近平的六点意见回敬。”字迹铿锵有力，老师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的六点要求，具体内容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任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此外，王世浚教授还特别强调每点里都提到了“创新”的巨大作用，“创新”这两字的精神对于我辈的影响、对中国未来发展巨大影响。

老人见到年轻一代十分激动，开心地与我们分享了写给重孙女的一段寄语，文中写道“从小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长大报效祖国，造福民众”。作为差不多的年轻一代，



我们也能从这段话中感悟良多。那不仅是一个长辈对后辈的殷切嘱咐，更是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对中国发展的祝福。教授还谈到，不仅要中国好，还要全世界都好，世界和平才能真正达到安居乐业的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应当努力做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要达到

热爱人民，世界大同的境界，“达则兼济天下”，从老师身上体会到了岁月沉淀、洞察世事的品质。细想来，我们新青年要从老一辈专家学者身上修习的品性还有很多。王世浚教授看到我们也追忆往昔，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光，他慷慨激昂地感叹70多年前也与我们一样的年轻，“真好，真好，年轻真是好”，他说年轻人就要多与老人谈话，不管是与老头老太还是家里的父亲母亲，作为过来人，能传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也能分享各色有趣的故事和经历，年轻人也能更好了解每个不同时代的背景和历史，非常有趣，我们深以为然。

短短两个小时，我们四人收获颇丰，从与王教授的对话中，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医学方面的发展也逐渐浮现眼前，我们敬佩无数像王世浚教授一样的优秀学者、先辈们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秉持着吃苦耐劳、一心为国的学者精神，不弄玄虚，不翻花样，从头辛苦干，只为了做出好成绩，为

了国家的成长。如今我国欣欣向荣的医学事业，是他们用智慧和拼搏造就的！作为新一代祖国的希望，我们应该向这些长辈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品格，做一个踏踏实实，勇于创新

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好青年，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之路走得更远！

(编辑：王天晴 张宁悦)

坚定学医不放弃，严谨行医报社会

——伍福乐教授访谈录

张玲 吕振港 管佳恒 万理林 陈怡文

伍福乐教授，生于1924年，194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4年正式入学，1951年毕业，毕业后留任原南京华东军区总医院即如今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做外科医生，后调至八四医院，同时担任丁家桥医学院的教学任务直至退休。

高中毕业后，伍福乐教授看重医务工作者清高、不求人、有尊严的职业特点而报考了长年限的医学院，最终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录取。在伍福乐教授在医学院的生活紧凑而朴素，在只有专业毕业率仅为大约30%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毕业。

大学毕业后，伍福乐教授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实习，五年后来到了现在的丁家桥医学院，在医院工作时，他参与了医学院的教学，培养了

一批很优秀的学生。在这段教学时光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块遗失了的活体兔标本，当时研究生们都找不到，最后还是他从污物桶的一块纱布上找到了。教授认为，无论对于科研还是临床，将取下的标本保管好是工作人员基本功。

在行医的过程中，他下乡亲身经历了江苏血吸虫病流行事件。他下乡行医的工作就是处理血吸虫导致的大脾脏问题。值得骄傲的是，在这次救助血吸虫病患的任务中，虽然当时农村卫生条件非常差，但伍福乐教授主刀摘取脾脏的85例手术中，无一例出现任何医疗事故。当时出现在其他主刀医生开刀后，病患连续出现三个膈下脓肿的情况，伍福乐教授经过现场探查和手术回顾发现手术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手术器械的消毒问题。正是由

于伍福乐老先生发现得及时，此后手术失败率大大降低，且原来出现膈下脓肿的三个病人都得以康复。此外，在八四医院行医时，伍福乐教授还将自己的饭票赠送给患有膈下脓肿但生活艰苦的病人，此举受到了病患家属发自内心的感谢以及当时医院领导的表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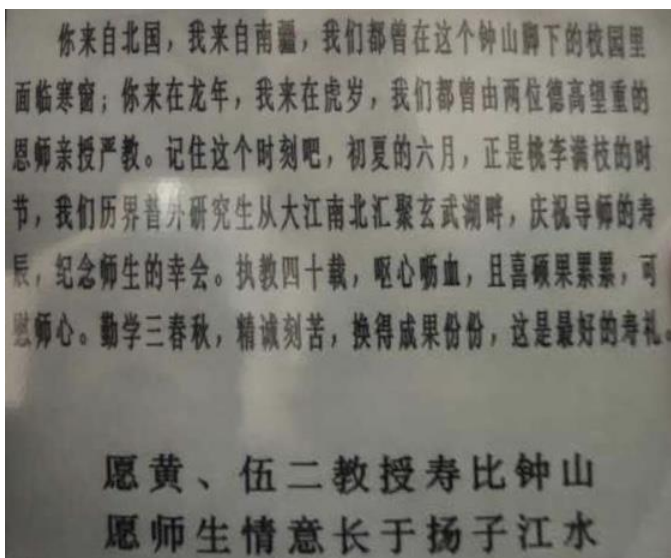
伍福乐教授不仅在工作期间尽心尽力，退休后仍然心存善念，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教授年轻时家境贫寒，在求学生涯中吃了不少苦，退休后本着希望医学生能够更好专注于学业，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奋斗的初心，他与妻子周大华成立了伍福乐周大华奖助学金以奖励医学院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寒的学生。

求学之路

伍福乐教授原本一直居住在湖北宜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由于武汉沦陷，所以同年伍福乐随家人逃至大后方四川，直至高中毕业。

在面临大学的选择时，由于家境不好，而医学本科需要6年的学习，协和医学院需要读8年博士毕业，而伍福乐教授原本希望读一般专业的本科4年，便能早一点赚钱支持家庭，但经过考虑后，觉得医生有着清高的特点，不求人，有尊严，所以最终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学医。

由于解放前全国高校招生不是统考而是各个学校自己招生，且录取率较低，例如国立中央大学在四万个人中只录取四百。1943年，伍福乐教授分别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由于优异的成绩最终均被录取。但由于同济大学和齐鲁大学是私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作为国立大学，不收学费且会发餐券，所以他最后选择了解放前超越清华北大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但由于家中父亲早逝同时抗战时期经济上有点困难，所以伍福乐教授选择保留学籍，打工一年赚生活费。1944年才真正入学。



学医生涯

国立中央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将校址从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一年级的学生统一在位于重庆的郊区的新生院统一学习公共课。由于抗战原因，中央大学、华西和齐鲁在成都成立了一个三大学联合医院，所以医学院二年级学生需要去成都校区进行专业知识方面学习，而其他学院二年级学生则前往沙坪坝。

当时的学医生活紧凑而艰苦，医学课程也较为困难，因为没有统编的教科书，到图书馆也只能借到英文原文书籍，所以笔记非常重要，这就要

求医学生们在老师上课讲课时及时跟随老师步伐做好笔记，下课后同学之间相互补充笔记内容。由于艰苦的学习环境，每年都有人被淘汰或自动放弃学医。一般而言，中央大学医学院一年级大概有一百名学生，到二年级时仅剩一半，最后能成功毕业的只有二三十名学生，这些被淘汰的学生中部分因为课业不及格，部分是主动打退堂鼓改学其他专业。例如伍福乐教授的一个潘姓同学，成绩还比较好，但当时有一门对各个动物的解剖结构进行比较的解剖学专业课，该同学不及格需要补考，由于对数次补考仍不得通过后感到厌烦，他便放弃学医而转入了农学院。伍福乐教授平时还会自嘲道：“六年后他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而我们六年才刚刚本科生毕业。”

1946年抗战胜利，伍福乐教授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适逢抗战胜利，实验仪器都封箱准备要迁回南京，但因为伍福乐二年级去成都的时候刚好生了一个月的病，所以他需要补做

一门生化实验，但该实验又需要实验仪器的辅助，并且老师不能因为一个人补做实验而开箱，所以他就只能再念一年本科。这也是为什么伍福乐教授花了八年时间读本科的原因。

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改成南京大学，1951年伍福乐教授大学毕业时已经变成了南京大学医学院，所以伍福乐较为完整地见证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至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变迁。

1951年毕业后，伍福乐教授被分配留在南京华东军区总医院实习，即现在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教学生涯

实习结束后伍福乐教授便留在了华东军区总医院做了五年外科医生，五年后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四医院，即如今的中大医院，自从调过来后就一直留在了丁家桥，教书行医。

伍福乐教授十分重视自己教书育人的责任。在原铁道医学院执教时，

他培育了众多优秀学子，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教授兔子脾脏切割手术的术后处理过程。当时他教授完研究生们兔子脾脏切割手术的操作后，取下的一小部分标本应该送去病理检查，但几位研究生表示自己取下的脾脏标本找不到了，打算不了了之。伍福乐教授强调对于医务工作者，没有妥善保存取下的病人标本，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并要求研究生们四处找寻，但仍然无果。于是，伍福乐教授亲自



翻遍了污物桶和垃圾堆，最终在一块纱布上发现了切除的脾脏。伍福乐教授的此种行为是“言传身教”的最好表现，他告诉学生们：“身为医生，就应该工作认真，心思细腻，对病人负责”。伍福乐教授正是凭借这种言传身

教，为原铁道医学院培养出了很多卓越的医生，包括如今中山医院的院长樊嘉院士，四川卫计委沈骥主任等等。

对于医学生，伍福乐教授认为，应该让他们明白“做医生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

行医生涯

在伍福乐教授行医生涯中，曾经有过许多刻骨铭心的瞬间。在毕业的初期，他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实习，留任外科医生五年，之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四医院。在这个期间，伍福乐先生不仅志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住院医师之一，并且积极下乡解决当时江苏地区流行的血吸虫病。

在1972年，伍福乐教授志愿加入了江苏省下乡手术队，并担任一队队长，去农村基层医院帮助救治血吸虫病人。当时农村医疗条件简陋，伍福乐教授就用塑料布把粮仓封闭起来用

作临时的手术室。

在整个下乡期间，伍福乐教授为血吸虫病人手术成功率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往往会有大脾脏的症状，继而进展为难以治愈的膈下脓肿，所以病人往往需要做脾脏切除手术。由于当时医疗仪器匮乏，没有如今的超声等装置所以难以检测病人体内病情，只能通过膈下位置的盲穿，以抽到脓液，证明是有膈下脓肿。

整个下乡队伍一共有三个手术队，其包括由伍福乐教授担任队长的一队。当时其他两个队做了40例大脾脏手术，都有失败的案例，而伍福乐教授的队伍一共做了85例脾脏切除手术，手术量是其他两个队伍的总和，但未有一例失败，而且伍福乐教授还通过观察其他队伍的手术过程，发现了手术失败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案，最终使得所有血吸虫患者基本都得到治愈。

那时候，其他两个手术队在手术后连续出现了3例膈下脓肿的危急情

况。为处理该情况，伍福乐教授仔细观察其他队伍的手术过程，详细询问手术医生，深入思考手术潜在问题，最后发现是消毒出现了问题。由于当时队伍里的赤脚医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对高压锅消毒时间的理解出现了错误，一点火进行消毒就开始计时，而不是在高压锅压力达到熵泵值后计算消毒时间，所以导致手术器械的消毒时间不足，清洁度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授提出了一个土方法，将山芋放入锅中，如果山芋润了，变黄

了，那就代表消毒完成，反之，如果山芋还泛白或者还硬，就是还需继续消毒。在这个方法推行之后，就再没出现术后膈下脓肿了。

此外，输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保守，认为人不能抽血的。但是伍福乐教授带领手术队以身作则，一方面通过宣传和有偿献血，另一方面自己在输血处做示范，于是渐渐地就有人开始献血了。到最后，每次做脾脏手术的时候，都有 2-3 个人在传达室等候，以保证手



术血源需要，为手术成功提供保证。

除了在医疗工作上的贡献，伍福乐教授还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资助经济困难的病人，做到了“医者仁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四医院工作过程中，伍福乐先生收治了一位肾周脓肿的农村病人，在患者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并且吃饭的粮票不够的情况下，伍福乐先生主动地将自己的粮票给了病人。而彼时 1951 年伍福乐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70 多块钱，但是他却没有做声，直到病人后来出院时将此事告诉了书记，老书记才知道并惊诧于他丝毫未提及此事。伍福乐教授说：在那个时代，医生不是收取红包，而是救济病人。

回馈社会

如今，伍福乐老先生已到耄耋之年，虽早已离开东南大学多年，但仍心系东南大学医学院的学子们学习和生活情况。由于年轻时家境贫寒，伍

教授在求学生涯中吃了不少苦，所以在退休后特地和妻子周大华一起成立了伍福乐周大华奖助学金，用以奖励医学院品学兼优但又家境贫寒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学业，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奋斗。他说：当时上大学时，经济困难的自己也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的帮助，如今有所成就自然要帮助现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伍福乐教授深知，在他学习和工作的时代，中国医疗卫生水平与国外相差很大，虽然近些年我们已经在逐步赶上，但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还需很长一段时间的奋斗，所以他寄望于东南大学医学院的每位学生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成为全心全意投入医学的医务工作者，肩负起这项发展我国医学事业的重任，为祖国的医疗事业奋斗！

（编辑：李嘉伟 张宁悦）

埋头耕耘不言悔，醉心科研结硕果

——刘功云教授访谈录

陈怡文 陈文雅 王溥丰 徐帅磊

刘功云教授，1920 年出生（身份证登记时登记为 1925 年），湖北人，汉族。掌握多门外语技能，英语可读、写、译。专业方向方面，刘功云教授主攻微生物及免疫学，尤其对传染病快速诊断及应用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发现了艰难梭荚

膜杆菌，制备单克隆抗体并将其运用在流行性出血热中等，将科学研究转换为临床应用，在上世纪国内科研不甚发达的时代起到了引领与模范作用，后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刘功云自小出生于一个非常富足



的名望家庭之中。她的父亲刘南如，7岁进入私塾读书，清末毕业于汉阳预备中学，因成绩优异，被张之洞所认可，于是被派为中国首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攻读法政，兼攻国学，当时正巧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他作为时代进步青年慨然加入，并任东京总部会计兼干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刘南如由日本回国，应友人约赴甘肃省任实业厅秘书。不久后被推为甘肃律师公会会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及氛围的影响下，刘功云也养成了非常好强的性格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她从小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不愿落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求学经历

刘功云最初选择的方向其实并不是学习医学，她在高中毕业后，由于外语成绩格外优异，她考取至武汉外国语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一整年的学习。然而，因为一件事让她放弃了继续学习外语，毅然投身与医学事业

中。当时正逢抗战时期，刘功云的父亲不幸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经治疗无效后离世。这件事情对刘功云的影响非常深，父亲因病去世让她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医学的重要性。她认为学医的话不仅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亲人，还可以去挽救更多的生命。正处国家动荡时期，战乱不断，伤亡与疾病是国家必须面对的难题。当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交织在心间时，她能感受到，内心想要学医的信念极其强烈，这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由于当时大学不是统一招生，需要到高校内考试，于是乎刘功云就和3位同学一起跑到重庆参加考试，放弃已获得的的成绩，从头开始！在那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想象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最终刘功云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国立同济大学7年制医学院录取，而当年的一名随同伙伴也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回忆起大学求学的日子，刘功云回忆到，有段时间（抗战时期），他们躲在防空洞里，一边躲

避战争中不断落下的炸弹，一边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刻苦学习。据说当时的防空洞口附近还堆积了很多的尸体。当时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教案和辅导书，最重要的便是上课紧紧跟随老师讲课的步伐整理笔记。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刘功云一行人也能静下心来专心学医，而课堂外残忍的战场和惨重的牺牲，则更加坚定了刘功云和同学们学医的决心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抱负。在自身的勤奋钻研和同学的互相帮助下，刘功云一行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医学基础，踊跃出一波极其优秀的当代医疗人才。

1952年刘功云毕业后留校任教，最后选择研究微生物和免疫学方向，加入医学微生物教研组，成为教授。



在当时，微生物和免疫学方向的研究其实还不是很多，而且在当时的国内，这个领域还尚未被人熟知。于是，刘功云四处讲学，传播微生物和免疫学的相关知识，并且同时还继续着科学研究任务。刘功云认为这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大部分的生病很有可能就是和一些常见的致病微生物有关，而如何识别微生物及如何有效杀灭它，是在源头攻克疾病的关键。在未来的日子里，刘功云在传染病的微生物与免疫学的治疗方面及相关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校期间，她认识了同在同济大学、学习工科专业的先生，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携手相伴未来几十年的岁月。

教学经历

奶奶回忆起当年的教学经历，她说最初选择微生物学就是因为发现大多数疾病由微生物引起，比如她的父亲所患肺结核，便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眼看着父亲饱受病魔的折磨，医生们却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等原因，

对父亲的病情束手无措，最后父亲痛苦地离世。所以在毕业之后刘奶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在基础医学院进行微生物教学和微生物研究，而当时国内的微生物和免疫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动，刘功云来到了东南大学医学院（原南京铁道医学院）从事微生物学教学及研究工作。

刘教授说，在教课上，她不喜欢死板地将知识填塞给学生。她会将知识融合贯通后，以风趣而又不失严谨、易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的方式进行教学。她回忆起当年学生这样评价她：“刘老师，我们同学最喜欢听您讲课，您能把书上的知识讲得清楚，而且上课也不看讲稿，将知识一条一条地清楚地传达给学生，我们都非常喜欢上您的课。”

刘奶奶想起当年的教学生涯时感慨于20年出生的她并没能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改革开放后的人才，但她对

文化大革命前教导的学生记忆犹新。

在教过的学生中，让她记忆最深的就是58级、59级、60级的学生，其中因为非常地刻苦用功、经常找老师问问题的58级学生蔡仙德、朱培志、59级学生王思逸（具体人名不详）更是给刘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功云教授除了在科研上耐心引领，在生活中也处处关心、体贴学生。据刘老师的儿子回忆，母亲经常晚上在家做好汤后，会额外带一份去实验室给她的研究生。问及原因，刘教授回答道，学生们常常做实验到晚上非常不容易，在生活中能给予一些关心是一些。

我们还有幸看到了刘教授和她的学生的珍贵照片。多年后相聚，学生们与刘教授依旧分外亲热。“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教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现如今，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上世纪医学界的栋梁之才，如各个方向的院长、主任、专家等。而刘功云教授，便是他们医学

道路上的启蒙者。仍有许多学生坚持定期与老师联系，互相了解对方的生活现状。在刘奶奶家，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学生寄来的信件和明信片，上面工整的字体寄托着对恩师的祝愿。

刘功云教授在教学和研究上颇有建树，为人处事却十分低调。为了这次采访，她的儿子特意准备了当年的劳动模范和模范教师的奖章供我们拍摄，刘奶奶却说，她从来不愿意佩戴这些徽章。她觉得拿这些勋章只是个形式，不如好好地在学校里教书，探究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寻找更适合孩子们的学习方法，让孩子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认真、坚定、真诚、慈祥、谦逊、淡泊名利，这是刘奶奶以身作则为教育者做出的典范。

科研成果

作为南京铁道医学院教授，刘功云一直致力于微生物学的教学及研究。1962~1985年评为江苏省微生物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组织委员，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刻苦钻研，不断提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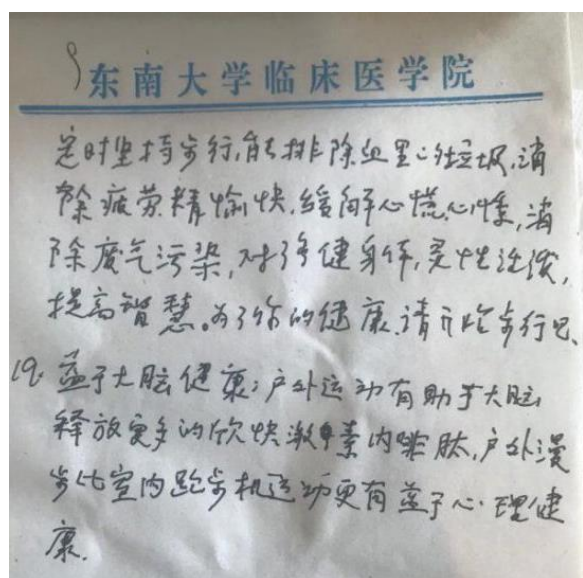
的发现。她主持的研究项目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刘功云退休后又回聘从事科研，解决了鲜为人知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快诊”，该研究属国内首创，获铁道部1993年科技进步三等奖，该文辑入《中国名医名药大观》一书中，1990年全国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展览会展出时又获优秀奖。“A-SPA 微量血诊断流脑快速法”于1983年在南京科技成果展览会展出，《人民日报》等报道，获1984年江苏省及铁道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该文辑入《中国当代技术商品大全》一书中，两文均被《科技研究成果公报》摘刊。《SPA 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在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及《艰难梭菌荚膜的发现和探究》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皆获1994年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在当时免疫学不太发达，而科研氛围也不甚浓烈的时代，有着跨时代的引领作用。其中研制的HRP-SPA试用于出血热、抗核抗体等检测，效果显著，优于同

类产品，1993 年底办学习班推广，先后完成科研 10 项，论文 20 余篇。刘教授将研究作为一生的热忱，她将实验研究化为临床真正应用其付出的艰辛是无法想象的，而其研究结果的价值也是无法估计的。

晚年生活

长期的科研教学生活，让刘功云教授养成了自律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终身学习的学习习惯。退休后在老伴去世后，刘功云仍然非常注重大脑和身体的锻炼，坚持每天读报，记录日记，进行一定强度的体育锻炼。刘老师非



常喜欢学习，对于时下很火的沟通交流软件运用自如，并且能自己在网络

上查询各种养生方法。她的儿子虽为她请了一个护工，但仍旧每天中午来到母亲家，检查她的日记，虽名为检查，但更多的是与母亲进行沟通交流，在采访的末端，刘功云老师的女儿也来到家中，看望母亲并带来了水果，温馨的家庭氛围令人动容。刘功云教授虽然已过百岁，但由于常年思维和书写的锻炼，刘功云仍能写出流畅俊秀的字迹以及清晰的逻辑思维，从一百减七一直减到六的算术做的非常迅速精准。回忆起往昔时仍能如数家珍般一件件想起，神采熠熠间让人似乎忘记了这是一个已年过百岁的老人。当提及日常锻炼时，虽然年事已高不便于下楼，但刘老师仍在家里保持着一定强度的锻炼，刘功云老师直接扶在椅子上向我们展示日常的踢腿、快走锻炼以及熟练的手指操，动作敏捷神色可爱间仿佛一个老小孩。

寄语

当刘功云教授被问到对新时代青年医生成长成才有什么建议时，她毫不含糊地说：“负责。”她说，现在有些医生过于急躁，对待患者缺乏耐心，不论是问诊还是治疗过程中都比较浮躁，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被有些患者误解，医患矛盾也多了，这样让年轻的医生很难得到学习的机会，更难以培养优秀的医生。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刻谨记自己肩负的责任，

心系患者，对病人多一些耐心和理解，多站在病患角度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温暖，同时不断增加知识储备，搞好科研，提升自己，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成为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她也给我们医学生提出了建议，作为当代中国医学生，不仅要有过硬的西医知识、手术技巧，同时也要对于传统的中医技术保持尊敬和学习的态度，只有做到不骄不躁，脚踏实地，才能成为优秀的医生。刘功云老师一再提醒我们要多思考如何



才能做一名好医生，为广大患者服务。路漫漫其修远兮，医学事业的道路伟大而又艰辛，希望每个医学生都能热爱并坚持自己的医学事业，不忘初心，怀着对医学事业的美好憧憬，砥砺前行。

我们东南大学医学院一直以来以精英教育的理念，实行一体化培养，配备学习型和研究型导师，发扬优良办学传统，着力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适应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高层

次、高素质临床医学与生命科学方面的精英人才和领军人物。刘功云教授对东南大学医学院的教育表示了很高的赞扬，并希望在老师的精心培养下，东大医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在医学事业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成为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

(编辑：俞蒋锴 张宁悦)

金玉其质，锦篇绣帙

——周玉篇教授访谈录

杨雯迪 顾倩 姜添铖 赵猛 罗彪

周玉篇先生是胸心外科教授，谈起为什么学医，他说道：“我像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学医，但学医后便干了一辈子。”

医路缘起

周先生是山东安丘人，他出生的年代是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是山东唯一一所医科大学，没有专业可选。周先生学的是理科但是当时没有理科招生，所以他就考到了医学院。说起人生中这一重大的选择时，老先生娓娓道来，报考了以后就录取了。那个时候共 40 个人报考，他们录取了 38 个人，当时的医学还是四年制。

学医历程

当时的中国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在大学授课的教授有中国人，也有日

本人，他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讲中文，有时候讲日语。因为当时社会被日本人统治，所以对日语比较重视，当时一个星期要上六个小时的日语课，就这样学习了两年。

两年后就是 1945 年，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国民党的接收人员来了。在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学生们都有种亡国奴的思想，但一听到是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然而，重庆方面来的人，医学水平也不是很高，周先生和当时的同学们在济南就只有中国的教授上课。

“小小”的胃穿孔手术

和现在的医学教育模式一样，理论知识学习完了以后，就有临床医生带教医学生们的实习课。周先生回忆，他那时候二十出头的年龄，在青岛的山东省立医院实习，是山东最高的学

府，当时有很多医生同周先生一样是从重庆回来的，也有山东青岛等地的临床医生。那个时候医生的临床水平非常有限，相当于现在医学院学生刚毕业的水平。周先生从事的是外科，当时外科医生的水平都非常有限，无论是从日本回来的，还是重庆来的。

他记得他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胃穿孔的病人，全医院的医生，无论是日本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个胃穿孔手术。针对这个胃穿孔的病人，全医院进行了讨论，实习生们也在进行旁听。直到晚上 11 点决定进行剖腹探查手术，剖腹以后证明了是胃穿孔，于是就把胃破的地方缝了两针，然后又把肚子缝了起来，就这样挽救了一条生命。周先生说，在当时做一个胃修复手术也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在外科实习的时候，基本做的都是阑尾炎、疝气的手术，老师带的非常少。

野战医院

1948 年共产党接管了，当时部队里面的医生非常少，周先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参军。1948 年底，他到野战医院后，是外科的主治医师。周先生打趣道：“其实当时我的水平还不如现在的你们，也没有老师带着我们做，但是什么事情都已经开始找我了，于是当时我们就一边看着书一边做手术，就是这样我们开展了胃切除手术和胆囊手术。”在当时，周先生就是外科的第一把手，后来他留在部队当了老师。在省立医院，周先生也是外科的带头人，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外科医生。在那个年代，招到了一批高中生，给他们培训 2 到 3 个月，就让他们到临床上去锻炼了。面对这群什么都不会的学生，周先生就慢慢地带着他们到了自己的这个水平。这一批学生遇上了周先生这样的好老师，有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周先生每带他们做一例成功的手术，他们就有了信心。

体外循环初探

后来，在胸腔外科工作的周先生因为没有做过手术、也不敢做手术，他决定再出去进修一下，他先后到南京和北京的军区医院各进修了一年。胸腔外科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以前从未见过体外循环的周先生并不敢做，于是便先在动物身上进行体外循环实验。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做一只动物就死一只动物。直到后来终于有动物存活了，周先生决定在人身上进行体外循环试验。他发现人的恢复能力比动物强很多，试验非常顺利。当时进行这样的手术非常冒险，但是周先生成功了，因此他也成为了当时野战医院的外科带头人。在此期间，他荣获了四次三等功，被评为了医院的模范工作者。之后，他又从84医院调到了铁道医学院。

外科医生还是非常辛苦的，而周先生选择外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他在学校功课做得还挺好，并且体力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外科手术需要

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他的体力可以支持。

第一次心脏手术

周先生第一次做心脏手术的经历，也是他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回忆。第一次做心脏手术的时候是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那个时候请了两位专家过来，周先生做手术，两位专家在他旁边指导，后来又请了他们两三次，两三次之后周先生就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台心脏手术了。这次在医疗技术上的成长与收获，对于周先生来说是质的改变，也是从医生涯的一次飞跃。

大别山支援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先生去大别山探亲。大别山医疗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他就被救火似地拉去当了“消防员”。

大别山环境非常艰苦，要血液没有血液，要医疗器材没有医疗器材，周先生便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救助。没有技术，他带着大家一起做。虽然他一个人能力有限，但是他会尽可能帮

助大家。没有血液，他告诉乡亲们要提前准备好三个血型相同的人。手术，尤其是开心手术，最重要的是麻醉。周先生把当时铁道医学院的一个医生调了过来进行麻醉手术。血液有了，技术有了，麻醉也有了，周先生决定进行治疗房间隔缺损的简单手术。

房间隔缺损手术，属于比较简单的手术，一般需要心脏停跳 15min 就可以完成，心脏复苏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周先生先从房间隔缺损开始，麻醉以后，他经胸骨劈开打开胸腔，周先生说这是最好的路径，病人恢复比较容易。



在大别山开展手术期间，房子都是土墙，天花板都是木头，在手术前用布遮起来，降低感染的可能性。输血前要三个人做血型交叉实验，才可

以开始输血。切开心脏，建立体外循环，缝合房间隔，能在 10-15min 完成手术。周先生在大别山开展过小的胃壁手术、房间隔缺损手术等等，总共完成十余例手术，手术都非常成功，患者都存活了下来。周先生强调，“在农村做手术，一定要注意无菌原则，第二个是一定要有麻醉医生。第三个一定有胸腔外科医生。有这三个条件，在农村公社里面，一般的手术也是可以开展的。”

一场探亲之旅，周先生挽救了十余人的性命，为大别山区带来了先进的医疗理念和医疗技术，真正做到了“大医精诚”，像一颗螺丝钉，去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发光发热，救助更多的人。

附：采访实录

问：爷爷您为什么会学医呢？

答：像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学医。

我是山东安丘人，我生的年代是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立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是山东唯一一所医科大学，没有专业可选。我学的是理科但是当时没有理科招生，所以我就考到了医学院。所以我就去报考了，报考以后就录取了。那个时候共 40 个人报考，我们录取了 38 个人，当时是四

年制。

当时是被日本人占领，所以授课的有中国的教授和有日本的教授，他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讲中文，有时候讲日语。因为当时我们被日本人统治，所以对日语比较重视，当时一个星期要上六个小时的日语课，学习了两年。两年后就是 45 年，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国民党的接收人员来了。在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有种亡国奴的思想，一听到是中国政府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但是重庆方面来的人医学水平也不是



很高，我们在济南就只有中国的教授上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理论知识读完了，就有临床医生教我们实习。那个时候我和你们差不多大，我们在山东省立医院，青岛的一个医院。那是山东最高的学府，当时有很多医生是重庆回来的，还有山东青岛等地的临床医生。那个时候的医生临床水平非常有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医学院学生刚毕业的水平。我是搞外科的，当时的外科医生水平，无论是从日本回来的，还是重庆来的，水平都非常有限。我记得我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胃穿孔的病人，全医院的医生，无论是日本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个胃穿孔手术。当时全医院进行讨论，我们也在进行旁听。直到11点的时候决定进行剖腹手术，当时剖腹以后证明了是胃穿孔，于是就把胃破的地方缝了两针，然后又把肚子缝了起来这就挽救了一条生命。当时做一

个胃修复手术也是非常高兴的。当时我们在外科实习的时候，就做一下阑尾炎、疝气的手术，当时我们的老师带得非常少。

然后就到了48年共产党接管了。当时部队里面的医生非常少，所以我决定参军，是48年年底。当时到野战医院后，我是外科的主治医师。其实当时我的水平还不如现在的你们，也没有老师带着我们做，但是当时什么事情都已经开始找我了，于是当时我们就一边看着书一边做手术，就是这样我们开展了胃切除手术和胆囊手术。当时我就是外科的第一把手，后来我就留在部队当老师了。在当时的省立医院，我就是外科的带头人，同时培养了一批外科的医生。当时招到了一批高中生，给他们培训2到3个月，就让他们到临床上去。他们当然什么都不会，所以我就带着这批学生慢慢地将他们带到我这个水平，所以这一批学生学习的机会比较好，而且还有老师带着，我每带一次他们做了一

例成功的手术，他们就有了信心。

后来我到南京的军区医院进修了一年，又到北京的军区医院进修了一年。当时的胸腔外科手术，我还没有做过，也不敢做，但是当时的胸腔外科有很多手术需要做，于是我就决定再出去进修一下。胸腔外科实验需要进行体外循环，但是我没见过体外循环，所以我不敢做。于是在动物身上进行体外循环实验。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做一只动物就死一只动物，到后来终于动物存活了，于是我就决定在人身上进行体外循环试验。后来发现人的恢复能力比动物强很多，于是试验就成功了。当时进行这样的手术非常冒险，但是我成功了。于是我就变成了当时野战医院的外科带头人。在此期间，我荣获了四次三等功，被评为了这个医院的模范工作者。后来我从84医院调到了铁道医学院，外科医生还是非常辛苦的。我为什么要选外科呢？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在学校功课做的还挺好，同时我体力也非常好，

因为有的时候外科手术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而我的体力可以支持。

问：爷爷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做的心脏手术是什么时候？

答：第一次做心脏手术的时候是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那个时候请了两位专家过来，我做了心脏手术，两位专家在我旁边指导，后来又请了他们两三次，两三次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独立一个人做心脏手术了。

问：那爷爷您还记得大别山的事吗？

答：大别山这个地方环境非常艰苦，要血液没有血液，要医疗器材，没有医疗器材，所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说没有技术的话，我可以带着你们做。虽然我一个人能力有限，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没有血液的话，这个你们得提前准备好三个血型相同的人，这样的话手术就可以开始了。手术最重要的是麻醉尤其是开心手术，麻醉手术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就把铁道医学院的医生调了一个过来进行麻醉手术。这样的话血液有了，技术

有了，麻醉也有了我们就决定先做简单的手术。房间隔缺损就是很简单的手术。

房间隔缺损手术，属于比较简单的手术，一般需要心脏停跳 15min 就可以完成，心脏复苏一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从房间隔缺损开始，麻醉以后，打开胸腔，胸腔最好是胸骨劈开手术这条路，病人恢复比较容易。

大别山做手术，要血源没有血源，要技术没有技术，在大别山开展手术

时，房子都是土墙，天花板都是木头，所以在手术前用布遮起来，避免感染可能性。输血前要三个人做血型交叉实验，就可以开始输血了。在大别山开展过小的胃壁手术、房间隔缺损手术等等。切开心脏，建立体外循环，缝合房间隔，能在 10-15min 完成手术，我在大别山总共完成 10 来例手术，都存活成功。在农村做手术，一定要注意无菌原则，第二个是一定要有麻醉医生。第三个一定有胸腔外科医生。



有这三个条件，在农村公社里面，一般的手术也是可以开展的。

问：您当时去大别山是哪一年？

答：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去的。

问：是因为什么原因去的呢？

答：探亲去的，老太太在那边。

当时主要是人员缺乏，胸腔外科医生，麻醉医生，手术护士等。

问：您对当代大学生有什么希冀，嘱托，建议？

答：对知识是第一位的，没有知识就掌握不了疾病的规律，有了知识诊断才能正确，正确的诊断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技术，一个手术没有开展过，你一定要做动物实验，在狗身上，心脏停下来，一定要在手术后能跳起来，所以动物实验一定要过关。并不是每个人的手都是灵巧的，所以选心胸外科的人，手巧很重要。所以做医生身体要好，技巧要好。做医生不一定要做外科医生，做外科医生不一定要做心胸外科医生，所以做心胸外科医生要有选拔。

（编辑：李嘉伟 张宁悦）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董意如教授访谈录

吉欣田甜黄淳淳阮亮

董意如，男，1927年7月生，河南省安阳市人，南京铁道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神经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卫生厅第一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52年毕业于第五军医大学。之后从事科研、教学和临床工作等。

幼时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时，董老正值上小学的年纪，而当时驻扎于附近的日本军队以太行山区里游击队的不断骚扰为由，对太行山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听闻日本兵要来扫荡的消息，当时尚是稚童的董老早早地便跟随家人躲进了山里，也正是这样，董老一家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待扫荡结束，董老下山回到村中，见到的是一片火海，所有的房屋都已经被日本兵放火

烧为白地，只剩下断壁残垣。董老听侥幸逃生的老人说起过日本兵在扫荡区所犯下的罪行，时至今日依然清晰记得。在扫荡时，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防止游击队躲在百姓的家里，日本兵就放火烧屋，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失去生活的倚仗。更可怕的是日本兵丧心病狂地以杀人为乐，将百姓屠杀一空，甚至心中丝毫没有对孩子的怜悯，仿佛野兽一般嗜血，将孩子以各种方法折磨致死。董老小学时的八个女老师为了不被日本兵抓走悄悄躲藏在老乡家的阁楼里，可日本人放火烧屋，如若不逃出阁楼只能活生生被烧死，老师们不得不将梯子放下来逃生，可这正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日本兵就将女老师都抓住强奸，之后更是将女老师们在田野里杀死，将太行山区变成了一片人间炼

狱，日本兵犯下如此种种，董老直感叹：“日本兵不是人，不是人，他们的恶是无法想象的啊。”

在城里，日本兵为了维持秩序，有着一定的约束，幼时的董老也曾亲眼见到过百姓被日本兵碰上，身上的钱财、首饰、手表都被洗劫一空；也曾看到过汽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高丽女人被安置在城里，后来也才知道这就是被日本兵抓来的高丽慰安妇。即便如此，在城里也算是好的了，在乡下，日本兵更是惨无人道地用毒气来毒害百姓，立起释放毒气的设备，毒气随风扩散，人简直无法存活下去。董老曾与一个日本兵交谈，日本兵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并说“中国大大的大圆圈，日本小小的，我们要在这里死了死了的。”在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无法完全打败中国，日本兵也厌战了，也想回家了。董老幼时的所见所闻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对恶魔一般的日本兵深恶痛绝，所以他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感到庆幸，也深

切地嘱托我们要感恩现如今的国泰民安。

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把大半个中国给占领了。为了董老能够继续学习，他父亲决定把他送到西安姑母家。现在看来很简单的一段旅途，在那个年代却是极其艰苦的。要先徒步渡过黄河到洛阳，再从洛阳坐火车去西安。徒步渡过黄河的路上，可以见到许多日本炮台，日本人就拿着枪站在那个地方，一旦发现国人就会开枪射击。所以在路上走的时候董老他们就要偷偷摸摸地过河，过河的时候需要把袜子、鞋子都脱掉。过一段河以后就需要赶快把袜子和鞋子穿上，再走一段路再过河。路途中大概经过了三条河。到了洛阳后乘坐火车前往西安，火车里人满为患，稍微有点空隙的地方就是两个车厢中间连接处，而董老就只能呆在那个连接的地方。结果火车一开，咕隆一声，差点就要掉下火车，幸好周围有大人及时拉住了他，才没有掉下去。就这样子，终于到了西安。

原本以为到达西安之后，可以见到姑母，能够暂时稳定下来，却没想到，姑母一家已经阖家搬到了西安三原，没有办法，董老只能去三原寻找他们。可那时，董老已经身上已经没钱了，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只能偷偷混上车。火车上是需要查票的，厕所车厢里都会检查，如果被检查发现没有车票，便会被要求下一站下车。董老凭借体型小，躲在了车上面的行李箱之间。在快要到三原的时候，董老下来了，没过一会儿，便有查票的人来了。董老说自己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有票。查票员看董老胸前口袋里鼓鼓囊囊的，便询问其口袋中装的是什么，董老解释到是学习英语的书，随身携带，便于学习。之后，查票员让董老给他读几段英文后也没有太为难人，让董老下一站一定要下车，下一站便是三原了。

在抵达姑母家之后，董老患了腮腺炎，还发高烧。那时候，并没有多少药，就吃了几片最简单的药，然后

熬了一段时间也慢慢恢复了。刚刚到达三原的一年里，董老就在家给姑母带孩子，同时，还不忘继续学英语，背单词。后来，被姑母送到附近的一个中学，在那里完成了初中一年级的学习。之后，日本常常轰炸西安，西安也不再安全，董老就跟在逃难的人后面一起逃往四川。

求学之路

那时候离成都最近的地方叫绵阳。绵阳市第六中学又叫国立第六中学，是专门给山东人办的。而董老是河南人，没有资格上，于是就撒了一个谎。当人家问他是哪里人时，他便称自己是山东济南的，这才获得了一次入学考试的机会。没想到竟还考及格了。考过以后就在那里上中学了。那时候一窝子的逃难学生，大家都没有钱，没有钱吃菜吃肉，每天只能吃米饭，长期缺乏营养，指甲都裂开来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击垮这群学生，反而激励了他们去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

力去获取食物。董老想到了一个点子，购买了一个小坛子，自己在野外抓一点菜放到坛子里，再加点盐，等几天再拿出来就是酸菜。之后，继续想点子，想承包学校搬米的活，然后赚取工钱。为此，董老还专门买了鸡公车去粮食站运米，鸡公车很便宜的，木头做的，一个轮子，可没想到，鸡公车也不是容易操作的。没有经验的董老第一次推车的时候便翻车了。米袋子都掉在了地上，搬起以后又出现了几次相同的情况，米袋子很重，董老又没有力气搬运，没有办法，只能请求过路的人帮忙，有个好心的大人帮着把米搬上去了，还告诉他推鸡公车的方法。说要把带子往肩膀上放好，然后推车的时候要扭屁股。董老就照着路人告诉的方法，不断摸索，不断尝试，终于把米顺利运到学校，拿到了一部分工钱。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去好一点的食堂买一碗菜吃。对董老而言，那个时候的经历回忆起来是极度艰苦的，抗日战争让他们的求学

之路充满艰难险阻。

后来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因为日本投降，很多的高中生都愿意上大学了。大概在投降的第二年，董老也来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打算参加考试，但是考试是需要排队拿号的。因为抗日战争多年，积累下的高中生太多太多了，队伍排的很长，一眼望过去，连队伍的尾巴都看不到，所以要拿到号码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还是冬天，晚上一两点钟，董老只能抱着一个棉被在窗口等着拿号。等拿到号码以后便去参加了考试。最后考及格了，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那时候想从四川来南京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董老没有钱，没有钱买不了火车票，就不能从四川来南京。于是董老只能求人家，作揖磕头，求人家让他上火车，最后董老坐在火车的顶部，就这样子到达南京。回到南京以后，和家人联系上了，生活也就好转一点。这段艰苦的求学生活给董老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当回想起来，不禁

唏嘘。

学业科研

在访谈中，董老还向我们回忆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与经历，讲述了国立中央大学变迁史，同时向我们讲述了东南大学的历史与医学院的变化。他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进步，国立中央大学慢慢地都分开了。现在的南京大学就是曾经的文理系，原来的艺术系现在就叫艺术学院，农学院就是原来的农学系……现在都进步了，进步很大，也都扩大了。接着回忆道，我们的学校和医院也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快速发展得益于牢靠的基础。董老通过回忆大学期间，他牢记解剖和病理等课程中老师的教诲，告诉我们扎实的基础是做事的前提。董老回忆道在学妇产科的时候，老师一上讲台就说：“你们回去再读一遍解剖，再来上我的课。”正是这样，那时大家的基础知识就很扎实。因为如果原来学习的基础不牢，学妇

产科会学不下去，回顾当年，董老在上学期就树立了极高的要求标准，而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董老不断告诫我们良好基础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的学生身处良好的环境，并且这些良好的条件都是前人不断积累出来得到的，认为现在的学生应该扎扎实实学习，打好基础，对于医学生来说，解剖、生理、病理，这些基础都十分重要。将来不管立志想成为什么科室的医生，这些基础都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础不好，将来你想做研究工作，

获奖成果项目
(1979—1986)

成果项目	授奖单位	等级	年份
1. 颈后三角区神经损伤的预防和 治疗《中华外科杂志》1966; 4, 216 副神经结缔组织引起副神经损伤 《江苏医药》, 1977; 3; 21	江苏省科协	四等奖	1979
2. 颅外—颅内动脉吻合术治疗缺血 性脑血管病《江苏医药》, 1979; 4; 10	江苏省科协	三等奖	1979
3. 游离大隐静脉移植治疗缺血性脑卒 中《中华外科杂志》1982; 20, 8	铁道部 南京铁道医学院	科技奖 一等奖	1983
4. 55例三叉神经痛手术治疗的 比较《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1979; 5; 199	南京铁道医学院	二等奖	1983
5. 采用大隐静脉移植行侧脑室— 外静脉分流术治疗脑积水《中国 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2; 8; 15	南京铁道医学院	二等奖	1983
6. SBD—02型脑立体定向的临床 应用《中华外科杂志》1984; 22; 350	南京铁道医学院	三等奖	1983
7. 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吻合 的技术操作《铁道医学》1979; 7; 162	南京铁道医学院	三等奖	1983
8. 自行研制的脑外科手术用头架 (临床应用, 实用新型)	南京铁道医学院	三等奖	1983
9. 80例脑立体定向术的临床分析 (江苏省神经外科会议上宣读论 文)	江苏省科协	四等奖	1986
10. DZY—A型多功能脑立体定向仪 研制成功《铁道医学》1986年2月25日在 南京通过省科委鉴定, 属国内先进水平	《土报医报》	《特刊》	
11. 旋转吸引器内窥镜器械研制成 功《1986年2月25日在南京通过 校科委鉴定, 属国内先进水平	《土报医报》	《特刊》	

说明：省科协、南京铁道医学院神经外科教研室、南京铁道医学院科技奖三次、铁道部科技奖一
次、中科院科技奖六次、上海医报特刊、河汉报特刊各一次。

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些成果都靠基础知识得来的，有的时候需要将生理、病理、解剖这些基础整合在一起才能够出成果，所以基础非常重要。董老一方面感谢曾经自己的恩师，一方面劝诫我们在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拥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有前人铺垫的扎实基础，更应该把握机会，踏实学习。

董老回忆道现在的生活好了，医学

事业也进步了很多。在董老的那个年代没有 CT，也没有核磁共振，身为研究神经外科的医生，董老回忆起来觉得曾经的这条路很艰苦，一开始神经外科就是要脑室造影，脑室造影是从头上打洞，把药或者是空气注入脑室，可以辅助诊断，后来就发展为从腰椎打气，气体进入脑室，从而可以把脑室显示出来，可以看到脑室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就怀疑相应位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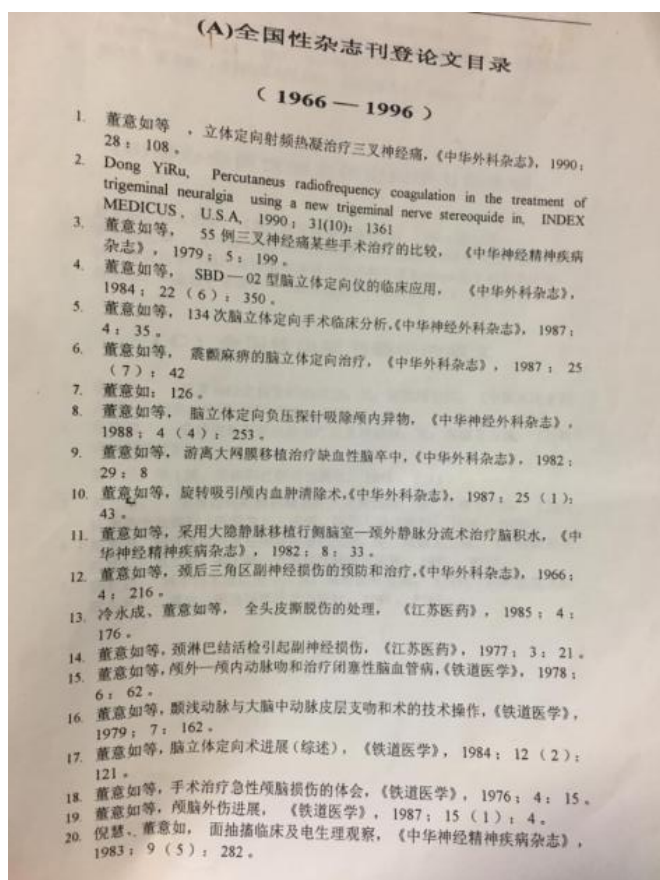
否为脑肿瘤。再进一步进展到气脑造影，后来是碘油造影。当年董老在神经外科工作的时候没有 CT，也没有核磁共振，走过的这个年代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年代。后来在北京就有研究者发展出了一个脑血管造影，那时候董老就专门到北京去学习这个脑血管造影，通过从颈动脉用注入含碘造影剂，两秒中打进去，就可以显示动脉的分布和行径，这叫脑血管造影。当时的年代，神经外科的发展道路是很漫长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要用来对病情进行诊断。

董老一直强调医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的重要性。譬如说运动系统就一定要注重神经和解剖，现在年轻的医生有了 CT 和核磁共振帮助诊断，可能就会缺少一些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董老那个时候就重点研究这些东西，因为不研究，就诊断不出来。有一天董老去医院，问年轻医生，运动系统的细胞有几类，他们都不知道，董老给他讲是两类，再问他们功能是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诊断靠的是 CT 和核磁共振的影像学结果，认为诊断已经清楚了，对一些基础的也就忽略了，所以对病人的体格检查也就马虎了，甚至于发现有的病人到门诊看病，一个眼睛瞳孔变大了，医生也没在意，然后住院十多天，问病人怎么瞳孔大了都不知道呢？病人就说医生没有讲，他现在不查体了。他为什么不查体？因为有核磁共振，有 CT。所以说，现在有了核磁共振和 CT 后问题也不少，虽然董老那个时候没有核磁共振，没有 CT，但是他们就是靠查体来解决疾病的。可见，掌握扎实基础的重要性！

杰出贡献

多年来董老一直以来从事多项重点科研、教学和临床工作——副神经损伤的预防与治疗，三叉神经痛、面



抽搐、缺血性脑中风、脑立体定向仪的研制及临床应用。董教授团队主要研制脑力定向仪，英文是stereotaxic instrument，该团队发明的多功能脑立体定向仪为“DEY—A”型，“DZY”是他们三个发明人

的简称。曾在南京的七二零厂生产，全国销售，在山西省、中国西北部、东北部等地推广使用。例如大庆油田医院，黑龙江的铁路医院都应用了脑立体定向，甚至包括北京天坛医院——当时全国神经外科最高研究机构，也曾使用董教授团队的仪器。1986年研制成“DEY—A”型“多功能脑立体定向仪”、“旋转吸引脑内血肿清除器”通过省级鉴定，属国内先进水平，已批量生产，为我国节约大量外汇，并为普及脑立体定向技术作出了贡献，晚近又研制成“三叉神经立体定向仪（DEY—B型），已成功地在临床上应用，属国内首创。在那个年代，董教授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全国出差指导使用，当时技术水平受限，很多单位对于他们的脑力定向仪的使用很迷茫。但董老表示虽然那时候的忙碌，换来最大的效益就是给我们学校和医院创造了辉煌的年代，所以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研制脑立体定向，每次想起来这些，回顾这些事情

就觉得很高兴，其实人这一辈子做不到几个成果，如果能够有一个两个成果就很不错了。

此外，董老还曾在全国性杂志发表论文 20 余篇，编著讲义三本《缺血性脑中风的显微外科治疗》、《脑立体定向学习班讲义》第一、二册，1987-1988 年共举办全国性脑立体定向学习班两次，在邀请瑞典脑立体定向专家来讲学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1987 年主持召开全国铁路系统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一次。曾荣获江苏省、铁道部及学院各类奖共九次，1963 年创建南京铁道医学院神经外科以来先后培养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 4 人，进修

生 50 余人，1987 年出席第八届欧洲神经外科国学术会议，宣读论文“脑立体定向颅内异物摘除法”倍受与会者称赞。《中华外科杂志》1990 年 28 卷 2 期上论文被国外权威刊物《INDEX MEDICUS》所收录。

董意如教授结合自己过去的科研经历殷切地希望新一代青年为研究工作打好基础，他表示虽然科技发展得很快，但不会改变的是基础知识与理论，并且所谓基础也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多方面积累，以及各方面的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编辑：王天晴 张宁悦)

波澜多姿人生雪，铿锵玫瑰似月明

——陈雪月主任访谈录

田宇嘉 杜天 王文帝 刘丽萍

她，是一位不惧危险、毅然决定成为外科军医战地医生的女人；她，是不惧辛苦成为急诊科医生的女人；她，是敢于挑战自己的未知领域并取得巨大成果的中医研究者；她，是坚持哪里需要就去哪的信念，参加两次援非的医生……

她，就是陈雪月，一位优秀的中国医生。

陈雪月的生命是多姿的，亦是波

澜的。她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951-1962年，是陈雪月事业不稳定，且困难重重的十二年。

1951，正逢抗美援朝，祖国意欲派志愿军支援朝鲜。前线部队需要医生补充队伍，对伤员进行治疗，并在杭州扯了布告进行宣传，希望能成立抗美援朝医疗队去支援前线，救治伤



员。刚刚大学毕业的陈雪月毅然决然要去前线，进行为期 6 个月的支援。

听到女儿这个消息后，父母急忙赶到杭州阻止，但陈雪月的极力坚持与国家对支援者的欢送场面触动了二老的心，最终同意陈雪月到前线支援。

6 个月之后，支援结束的陈雪月回到杭州。可那时，部队仍然面临医生急缺的问题，杭州领导便决定将他们派回前线，并分配到第三野战医院和第二野战医院的外科工作。第二年，陈雪月想，既然部队需要她，将她分配到部队，便有了参军，成为一名军医的大志。战事的影响导致当时的外科病人极多，陈雪月便主攻外科，并对其他科也做了一定的涉猎。

1956 年后，陈雪月被调入南京，进入南京第六军医学校（即铁道医学院的前身）的附属医院——八四医院外科工作。几个月后，陈雪月担任了外科的急诊医生，并不辞辛苦地值夜班。突然发生的意外却改变了她，值完夜班后的她于第二天早上骑车回家，

不幸在路上发生车祸，致使左手粉碎性骨折。便于 1957 年转入内科工作。

1958 年，学校进行集体转院，成立南京铁道医学院。1959 年，南京铁道医学院下发成立中医研究社，研究经络的任务。学校决定让陈雪月负责并为她指派了 3 个护士辅助研究。即使陈雪月此前从未接触过中医学，她也毫不犹豫地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她一边医治，一边学习，一有空闲时间就泡在图书馆看有关中医的书籍，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一分耕耘，终会有一分收获。在她的努力下，文章《一千例正常人中八十九位重症病人皮肤上的电位变化》于 2 年后问世。文章一出，立马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并就此报告，开展了全南京的学术活动。报告地点定在我校恢弘的大礼堂，参会人员为全南京针灸医生，足见影响之大。之后，陈雪月觉得自己已经在中医学的研究中做到了最好，且自己没有下一步研究计划，便撤销了中医研究社，回归到了内科的深入研究

中。这12年里，陈雪月事业起起伏伏，不断转换。但她心中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祖国需要我，我就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旗帜一直在她心中飘扬。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63-1976年，是陈雪月事业艰难拼搏的13年。4年在外学习，奔波于工地农村。5年援非，离家离国，在外奔波。她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女人，一位母亲。长期在外的工作让她无暇顾及家里。故而，5个小孩子的生活琐事，繁多的家务事，全靠孩子的父亲和外婆照顾，的确，正如陈雪月说的，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1963年，医院成立了心内科，任命郑雪红为组长，陈雪月为副组长。1964年，由于郑雪红被调走，陈雪月便扛起了心内科的重担。此时，科室有到沈阳医学院学习进修的机会，南京铁道医学院便派陈雪月去交流学习。当时一同前去学习的，还有国防部派去学习的第三军医大学的校长。在沈

阳医学院进修的一年，他们极受导师重视，因而也收获了许多专业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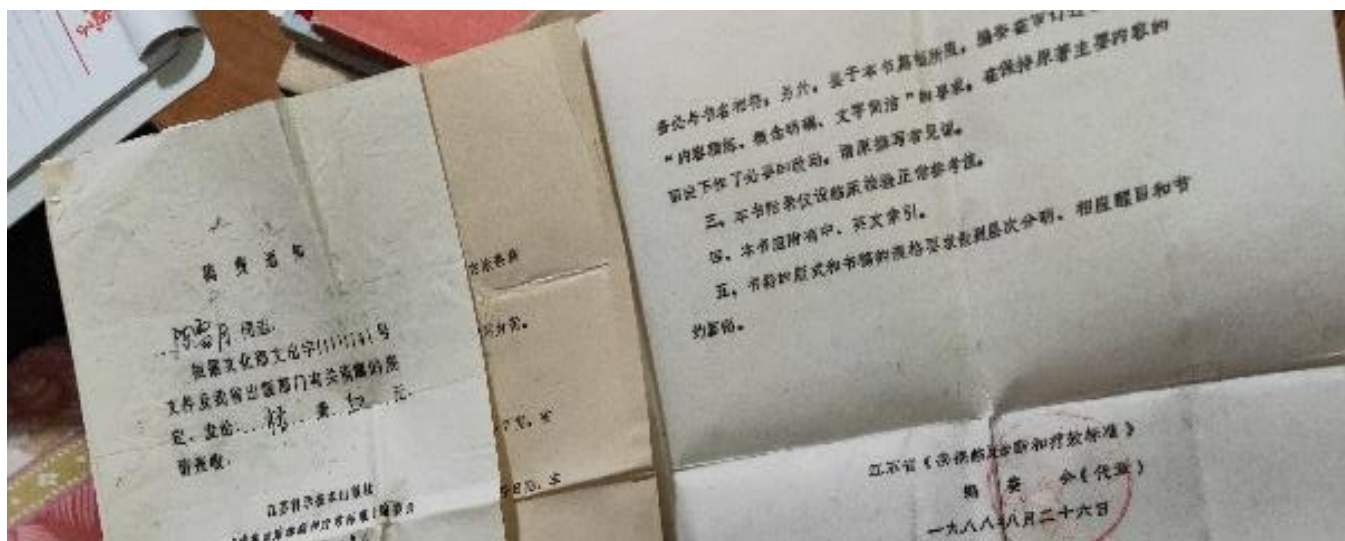
1965年，陈雪月被提升为主治医生。进修回来后的她，想好好开展工作，并把进修学习的知识与大家分享。但2个月后，她被派到南通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原本是为期半年的运动，却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4个月后，才回到南京。回到南京后，又逢学校教育与农村挂钩，学校派老师到农村劳动，故她又被派到南京林口农场参与劳动。

之后又被安排到老山，参加赤脚医生训练医生班的教学工作。半年后，她到镇江医院，辅助实习医生学习了半年。而后又在丹阳农村进行劳动。1967年11月至1968年5月，她参加到西南四川各地地区铁路工作的巡回医疗工作。1971年，她参与编写教材。1972年至1976年11月，她到非洲参加援建坦赞铁道的为期4年半的医疗工作。一般的医生护士都是两年回国，但陈雪月特殊。因为领导说，心脏科

的医生是受社会尊重的医生，哪边需要到哪边，且心脏科的病人大多是高级干部，故身为主治医生的陈雪月需要留下，并接受前两期的援非工作。

1974年，陈雪月在坦桑尼亚达西医院，除了为铁路职工看病，还给当地的高级官员看病。也曾给总统秘书、阿尔巴尼亚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大使、朝鲜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大使、我国第一位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他的

级官员及其家人看病。当时大使馆的官员为表达感谢，便在吃饭时为她加菜，陪她游玩，以表谢意。1980年4月11日，卡翁达访问中国，在南京东郊宾馆设置国宴并邀请陈雪月参加，同时在会议的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医生的尊重，说“中国医生对中非友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称陈雪月为“赞比亚人民的医生”，并与之合影留念。



夫人张稀先诊治过。刚开始时，陈雪月感到害怕紧张，但因为这些高级官员谦和的态度，几次之后，紧张感便消除了。1975年，她在赞比亚卢萨卡医院，在大使唐诵参赞陪同下，给其总统卡翁达看病，之后到大使馆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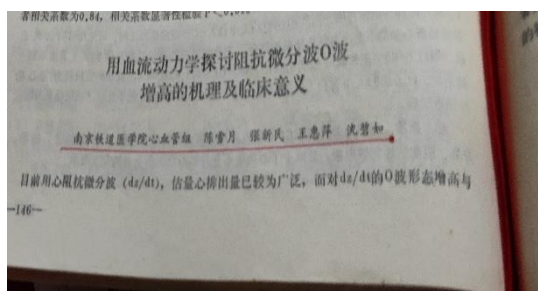
艰难拼搏的13年，陈雪月不断奔波在乡村、工地、非洲、世界。不辞辛苦的她却也不负众望，在世界，留下了中国医生的辉煌。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1976年到1987年的12年，是她心血管事业取得累累硕果的十二年。1976年，陈雪月担任了心内科的副主任，并于1987年2月，成为了心内科主任医师。

在此期间，她在医疗科研方面也有所成就。她是南京市（三甲医院）心脏病小组的主要成员，参与全市疑难病例讨论，会诊以及科研的评审工作。在她发表的12篇论文中，有2篇是非心内科的论文。一是于1963年刊登在《江苏省生理科学会会刊》上的《一千例正常人中八十九位重症病人皮肤上的电位变化》；二是于1977年发表的《非洲恶性疾病675例临床分析》；其余十篇都是有关心内科的论文。

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全国心血管年会上，陈雪月写了《临床应用热稀



释法、Fick 法与阻抗法测定心排出量的对比分析》和《用血流动力学探讨阻抗微波分波 O 波增高的机理及临床意义》两篇文章，大大提升了学校和医院的影响力。

1987年，陈雪月退休，却仍担重任。省领导有时也会就省里有关医疗工作的问题询问陈雪月的意见与建议，陈雪月也非常乐意回答。同时，1990年，陈雪月参与编辑了卫生厅出版的《疾病临床诊断和疗效标准》一书。

40年，陈雪月的一颗赤诚之心全扑在了医疗事业上。即使是周末，甚至是假期，她都会去查房。每次周日的早上，陈雪月必查房后才回家休息，不然不放心病人的安危。那个时候，每周的休息时间就只有周日，有时赶上周日下午政治学习，这一周的休息时间就没了，但陈雪月不觉得辛苦，因为她觉得医生应该对病人认真负责，无论是自己负责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都应该如此。

在行医的40年里，有两件事情给

陈雪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为必须要住院的病人安排床位。有一次，一个外地病人来医院看病，却因医院没有病房而不能住院接受观察治疗。第二天病人又来看病，刚好碰到陈雪月。陈雪月看完病人后，确定病人确实需要住院治疗，询问病人为何没有住院治疗。病人将情况如实告知陈雪月。陈雪月知道后，便马上打电话询问病房护士病床的情况，确认病床已无空余后，安排在走廊给病人加床。一旦有病人出院，立马搬进病房，让病人及时入院治疗。病人被治疗好后，亲自写表扬信刊登到《南京日报》上感谢陈雪月。

另一件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在陈雪月周日下午休息的时候，被急诊室医生请去会诊。此前病人诊断为房颤，现在病人腹痛腿麻，股动脉搏动消失，推断为腹主动脉血栓，建议做手术治疗。但其他医生建议造影，陈雪月特别果敢，坚持要求不延误病人的病情，应该立马做手术。由于不熟悉，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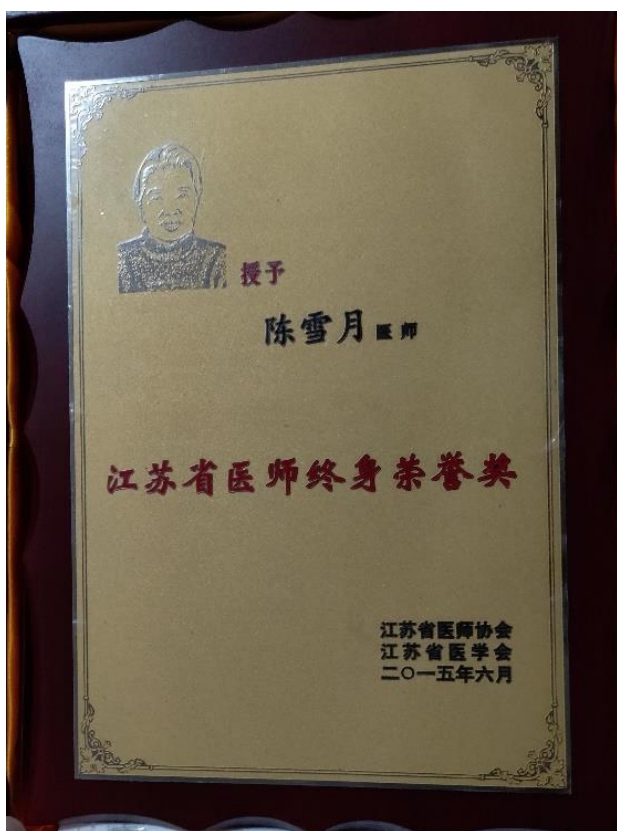
请军区总院的心外科的医生共同开刀。病人手术成功，恢复良好。第二天，陈雪月看望病人时，遇到病人的家属，病人的家属激动说“感谢你的当机立断，救了他的命”。自此，病人家属每次遇见陈雪月时，都十分感谢。

1986年，陈雪月快退休之际，有药厂代理商到医院来推销药物，找到了陈雪月，与她谈药物合作的事情。但陈雪月坚决表示不合作，坚持医生要对病人负责，根据病人的病情开药的原则。而不应该为了拿回扣和提成开药，不做有悖医德的事。

1956年，陈雪月进入南京第六军医学校，作为一名助教对野战外科实习进行教学。1958年，南京铁道医学院成立后，她作为助教参与内科诊断学教学，每天都到病房找典型的病例便于给学生们讲解，力求掌握和理解。文革期间，学校决定暂停教学。1977年到1982年，学校开始招生，陈雪月主讲心血管方面的知识，同时参与了多次讲学讲座。每一届的学生对陈雪

月的印象都很深，每一次学生举办同学聚会，陈雪月都会被邀请作为嘉宾参加，届时接受学生们的充满感谢和祝福的鲜花。同学会结束后，同学们会专门把做好的光盘送给陈雪月老师作为纪念，以表师生情深。

2015年6月，陈雪月被授予“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



在党支部开展的“90后对话‘90’后·读懂中国”活动中，我们有幸采

访了陈雪月奶奶，陈雪月奶奶也十分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精神奕奕的陈奶奶在我们去之前便很热心地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水果、巧克力等。面对我们的疑问，陈雪月奶奶也详细耐心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

1. 什么力量驱动您去参与抗美援朝？

因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因为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因为年轻就应该有满腔热血。我毕业时，恰逢抗美援朝，然后我毫不犹豫决定参加。家里父母担心上前线有危险，便立即赶到杭州阻止我。到了杭州之后，他们看到杭州市特别重视抗美援朝，百姓敲锣打鼓欢送上前线的志愿军和那些准备救治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的医生。最终，我的父母答应了让我上前线。

2. 在和平年代，如何表达我们的新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

在战争的年代，我1945年考入大学。当时正值抗日，学习条件十分艰

苦，当时的我便觉得国家的安定特别重要，爱国特别重要。在学校的时候，我一直好好学习，不理睬其他事。当时学校里有同学找我摔跤，我不摔，因为在学校里我就要好好读书。走出校门，开始在医院实习后，我就认真学习临床的知识。我还记得，当时学校里说新疆需要医生，班里的同学积极踊跃地报名，无论新疆当时的医疗条件多么艰苦，仍选择坚守在那。那时的我们都是热血青年，祖国需要我，我就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现如今，祖国强盛，正是你们学习的好时候。发展自己学习的专业，勤奋努力，出成果，爱党爱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贡献力量。目前，你们就要搞好专业，好好学习，发展科技的力量，毕业后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不停地转型，从外科转到内科，从内科到中医研究，最后转为心内科，这过程中是否困难？有哪些？

困难肯定是有的，当时领导安排

后，我就听从了。因为我一直想着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当然，当时从外科转到内科，会受到一些排挤。从内科转入中医的过程中，我边学习，边工作。遇到困难就克服，努力工作，坚信自己一定能做好。不能说我就不去，既然领导决定让我去，我就去。而且我去了，就一定要做好。现如今，你们要好好学习，毕业后搞好自己的专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对祖国有所贡献。要有决心，肯努力，能拼搏。你努力有理想的。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聪明加上勤奋。光靠聪明，不勤奋做不了大事。你们这么聪明，所以一定要勤奋，有所成就。

4. 非洲的条件艰苦，您仍然选择援非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国家需要我，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愿意去。同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位，我记得有非洲23个国家的支持，我非常地感谢非洲人民。所以即使条件艰苦，我也要去。

5. 下乡劳动时，有无耽误你的

学习、工作？

对我学习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条件太苦。当时我们下乡，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住的床下是鸡圈，条件十分艰苦。所以你们要珍惜现在的条件，好好学习。

6. 在事业生涯中，您意外受伤，手臂无力，只能从外科转入内科，当时您的心理？

说实话，当时挺苦恼的。当时我想转麻醉，但手无力，只能转入内科。但是我并未就此放弃。我努力工作，拼搏，勤奋，做好自己的事。我认为对病人认真负责关心，重视医德，才能做好一名医生。

7. 您对我们新一代的医学生，祖国未来的临床工作者，有什么寄语与建议？

好好学习，认真工作，拼搏勤奋，重视医德。

采访完陈雪月奶奶后，我们收获良多。作为一名医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勤奋拼搏，爱党爱国，毕业之后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当初庄严的宣誓一样，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身。

(编辑：俞蒋锴 张宁悦)

君子之风，医者之心

——冷永成教授访谈录

孙若语 杨钧岚 常婧瑶 江雨昕 曹鑫

与冷永成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家里，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屋子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刚洗净的草莓和各色糖果。满脸慈祥的微笑，一件利落合体的针织背心，冷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他的目光炯炯有神，话语铿锵有力，若不是提前做了功课，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九旬老人透出的精神气。伴随着我们的提问，老人将他的故事与我们娓娓道来……

“与丁家桥的不解之缘”

求学，工作，家庭。冷教授一生中的大部分故事都与这座丁家桥大院一同书写。

1951年的秋日，冷教授开启了他的医学生涯。那时的他，一如现在的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未知的一切都充满好奇。那时的丁家桥，

还被称作南京大学医学院。尽管条件简陋，却是很多德高望重的医学奠基人默默耕耘的沃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理学系的蔡翘教授，正是在这样有限的实验环境孜孜不倦，步履不停，最终取得了辉煌的科研成果。后来，学校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管理并改名成军医大学，很多人因此放弃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不过为了读书，冷教授仍然坚持入学。冷教授在丁家桥接受的教育，用他的话来讲，“是从社会发展史开始的，从最浅显的猿到人的进化开始，逐步深入到医学领域”。那个时代，这种由浅入深、由生活现象引入书本知识的教学方法可谓独树一帜，也正是这样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冷教授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195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学院，

1953年又再次更名为第五军医大学。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冷教授毅然脱下白衣，披上军装，为新中国的建设积极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1955年，第五军医大学与第四军医大学合并，大批师资力量和优秀学子因此迁至西安，当时正在南京军区总院实习的冷教授，却仍坚持留在南京，留在丁家桥这片情深至切的土地上。1959年，学校改名为南京铁道医学院。铁道医学院的名字，一直沿用了四十二年，直到

2000年与东南大学合并。冷教授幽默地说，这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经变革，医学院最终又回到了东南大学的怀抱。

每每回忆起丁家桥几十年来的风雨变迁，冷教授都感慨万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科研设备更是迅速引进。教学楼、综合楼、实验楼，附属医院一座座落成。一届



又一届的医学生们走进丁家桥，又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块经历沧桑百年的土地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界人才的诞生。而家住金川河西岸的冷教授，目睹着这日新月异的进步，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丁家桥，记录了冷教授走入医学殿堂后不屈不挠的金辉岁月。

“大家要立，小家也要好好经营”

30岁，是成家立业、奋力拼搏的年纪。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收入更是有限，苦中作乐无疑成了冷教授和他的夫人在风吹浪打中奋勇向前的窍门。冷教授说到这里，打趣道“哪能因为条件苦，就不想办法让生活甜呢？”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常还是家里的柴米油盐，冷教授和他的夫人总是相互扶持，共同进退。冷教授的夫



人郭老师回忆道：“年轻的时候，我们工资不高，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每天只多出一角钱买一颗咖啡糖，就为了让他能够提起精神在晚上看书。他在看书，我就在旁边织毛衣。”每一个有爱人陪伴的漫漫长夜，每一颗爱意浓浓的咖啡糖，都沉淀成只属于家人的温暖滋味。在以家庭为坚实后盾的光华岁月中，冷教授全心致力于医学事业。然而不久，他的妻子郭老师因工作调动不得不与他两地分居，本就处于事业拼搏初期的冷教授，肩上又压上了照顾子女的重担。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1岁，在没有母亲的陪伴和呵护的日子里，冷教授用宽厚的臂膀为孩子们挡住了这个小家的风风雨雨。他回忆道，那是一段当爹又当妈的时光，白天教学、工作，晚上还要陪伴孩子。只有等孩子们都入睡后的深夜，冷教授才能独自一人在书房看书提升专业知识，而属于冷教授的休息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小时。几小时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一天繁重的工作。春

秋轮回，不知不觉，就是三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夫妻二人都互敬互爱，相知相守，成为彼此为了新中国建设而奋力打拼时，心中最温暖的所在，也是最坚实的依靠。也正是这样对于事业和家庭责任感，冷教授夫妻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榜样。冷教授的三个子女现在早已成为各自行业的栋梁之材，他的小女儿更是继承了父母在医学事业上的奉献精神，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选择和爸爸妈妈一样服务群众，造福社会。三个孩子也都拥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童年里父母相互扶持的模样，早已被他们铭记在心，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他们为人父母的榜样。

“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

当我们问及冷教授对医患关系的看法时，他满脸慈笑，给我们缓缓道来一段经历。

1962年，当他还是一位年轻医生时，一位抗战老兵因左腿伤口溃烂就

诊，经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恶性骨瘤。经过多方会诊，经验老到的医生们提出了截肢这一治疗方案。当冷教授将这一方案告知患者时，老兵沉默片刻，而后笑道：“我这腿啊，抗日战场上没丢得了，总不会丢在这里吧？”冷教

肿瘤没有侵及骨膜，最终决定突破传统疗法，作肿瘤切除术后，采取冷教授擅长的整形术修为患者补了残缺肢体。创新大胆的治疗方案和对患者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让他与这位老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兵健在之时，



授听完十分震撼。可是当时的科室，医疗队伍比较年轻，因为之前没有相关的案例，可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面对这样的窘境，冷教授并没有因困难而退缩，而是积极联系外院整形外科的资深前辈，经过反复研讨，发现

逢年过节便会给冷教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冷教授出差时也会顺道去他家拜访，相谈甚欢。一医一患，始于手术，而结缘于人心。正如冷教授所说，真心待人，患者必将真心以报。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医生设身处地为病

人着想，用心柔软地包裹住每一个患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以正常生活为目标的人们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以往因身体缺陷而修补修复为主的整形外科，现在已经转变成以美

况为基础，给予一些适当的建议，设计出最好的方案让患者满意。正如冷教授所言，面对患者的坚持，我们不能强行改变他们的意志，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多想一点、多考虑一点。切身实地为患者考虑，这



容修饰居多的科室。当我们谈及此事，问起冷教授对于这一变化的看法时，他认为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每个人原始的五官一般来说就是最自然的。如果病人为了更好的外貌，坚持进行美容手术，医生也要以患者的身体状

份真诚与体贴，体现了一个医生的医德，也是每一位合格医生必须拥有的品质。

“做医生，要先做人”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逐渐

对整形外科赋予了更多美学方面的要求，大眼睛、高鼻梁和曼妙的曲线成了大部分患者的诉求。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诱人的利益面前，一种名为奥美定的高分子化合物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它被用于注射隆胸，化学名为聚丙烯酰胺，呈胶冻样，性质稳定。由于它见效快、创伤小、材料可塑性强，在很短时间就有近 30 万人接受手术。当奥美定风靡各个整形医院及诊所时，有生产厂商向冷教授发出顾问邀请。出于一贯严谨的态度和职业的敏感性，冷教授很快发现了奥美定高收益低成本背后的问题。通过对奥美定相关原理和背景的详细调查，在全国大范围收集临床案例进行分析后，冷教授很快发现奥美定注射隆胸存在炎症、感染、硬结、团块、质硬、变形、移位、残留等诸多不良反应。

在西安研讨会上，冷教授和当时美国整形外科协会主席就奥美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将其认定为一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美容产品。在冷教授

的建议和坚持下，江苏省几所公立医院包括中大医院整形外科坚持不将奥美定投入临床使用。一些整形医院也停止了对奥美定的引进和推广。除此之外，冷教授还组织多名专家，共同研究患者注射奥美定出现严重的副反应之后，如何安全地取出患者体内的奥美定残留，进而解决问题。因为冷教授的这份严谨与坚持，奥美定受害者的范围得以缩小，不仅如此，让很多注射之后遭受严重损害的患者也看见了康复的希望。

时至今日，再提及奥美定事件，冷教授仍会神采奕奕地向我们娓娓道来。三十载风雨沉淀后，奥美定带来的潮流已逐渐黯淡，而冷教授身为医者的赤诚之心却被打磨得愈发光亮。冷教授沉稳地对我们说：“在利益面前，我没有忘记我是一名医生。”

冷教授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是应当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下，以消除病人痛苦为己任，救死扶伤。医生，并不是圣人的代名词，

可一名医者必得拥有一颗仁人之心。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没有树立好自己的德行，即使技艺超群，也不值得病人真正的尊重与社会的名声。冷教授对我们说，希望我们这些医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为高超医术与高尚医德并存的医生，可以成为东南大学医学院的骄傲。

冷永成教授从事医学行业六十余年，作为江苏省整形外科的带头人，他获得多项省级进步奖，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为国家培养出一代代医学界的中流砥柱及专家人士。冷永成教授是医学领域的榜样，更是做人的标杆。可放眼整个中国，冷教授的故事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茫茫人海中，还有一大批为各自的事业，为祖国的发展，默默无闻奉献了一生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艰苦的时光中坚守初心，在未知的挫折中奋斗拼搏。家庭、事业，无论哪一个都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而祖国更是他们愿意奉献一生的信仰。采访最后，冷教授向我们展示

了他的全家福，“这是我的外孙女儿，那是我的孙子，他们啊，都在美国。”冷教授满脸温柔笑意，“可我一直嘱咐他们要回来，我们国家发展的多好啊，有了他们就能更好！”耳聆冷老有力的笑声，似乎拂面的春风也带走了年轻时经历的苦。无论是冷教授那一辈的老共产党员，还是现在朝气蓬勃的新一代共产党人，相隔70年的春夏秋冬，永远有一条线将我们紧紧相连。无数代的共产党人永远兢兢业业，永远满怀热血，永远忠于我党，永远热爱祖国。我们共产党人是六月里的花海，每一株渺小花朵都在摇曳着自己的光芒，我们永远向着太阳的方向奋发图强。

如今，90高龄的冷永成教授依然活跃在岗位上，保持每周门诊两次，例行查房一次的习惯。愿这位有着“君子之风，医者之心”的老人松鹤长春，幸福安康！

（编辑：俞蒋锴 张宁悦）

与祖国的90年风雨路

——高翼之教授访谈录

李建平 曹鑫 孔静庭 王家奇

家国情怀，无悔青春



1948年，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那年，他17岁。那时的生物系，本是个没有人愿意读的冷门专业，因为对生物系的学生来说，毕业就面临着失业。当大家纷纷避而不及，他却不同，因从小与生物结缘，初中一年级便对生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下定决心将来一

定从事生物相关工作。因此，真的到了报考学校的那天，他毅然决然选择生物系，并从此为之不懈努力。他说：“这是我真心痴迷的事情，我一辈子都想痴迷下去。”

可正当他如鱼得水，痴迷于生物学，不断地探求生物学知识，以为自己一生都将如此刻一般畅游于生物学的海洋时，一件大事发生了。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的号角响彻祖国大地，他的身份由一介书生陡然变成了一名军人。能顺利被录取进入部队为国效力，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对他来说不止意味着身份的巨大改变——这意味着让他放弃一生的热爱，一辈子的痴迷，并且这种放弃可能并不是暂时的，这一放弃可能改变高老一生的轨道。

高老先生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情

绪激动。他说：“习总书记提出‘家国情怀’，我认为这就是家国情怀！一旦国家需要了，你什么都要放在一边，再大的个人想法，个人追求，即使梦寐以求一辈子的事情都要先放一放。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事，你不可能后悔。”

就这样，怀着为国效力的赤子之心，他在部队待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做着的事情虽然跟生物学南辕北辙，但依然成果突出。他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好。”十五年的时间里，立了三次三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得到了部队领导的高度评价。

15年的部队生涯终于结束了，却又迎来了那十年浩劫，前前后后过了27年，所幸他终于和生物学再续前缘。这个时候的他，已经50多岁了。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年过半百，又回到了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当再一次拿起生物学书籍时，高老先生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又

有心头莹莹牵绕的激动。是的，心爱的遗传生物学，再一次敞开怀抱接纳他，这是一次全新的征程。过去的二十年如一日，虽身处异国他乡，他却无时无刻地心系祖国的生物学发展。苏联的李森科之难对祖国的生物学发展打击严重，在当时国内生物学尚处于一片混沌的情况下，高老先生简单判断局势，不为俗事所困，一头扎进实验研究中，专心做起他的学问。

永远争做世界第一是老先生的毕生追求。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国人有了更进一步的国际观念，在学术上更是紧跟国际最新学术动态，相继启动863等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以实现祖国先进科技的赶超。老先生一直强调不仅要紧跟国际先进步伐，更要有国人自己的创新，要做出自己的东西，勇争第一不仅仅是个人的成绩，更是永远要争做世界第一。这正与我们当下的科技创新理念不谋而合，也唯有掌握真正的核心科技，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永续发展。

在高老先生在外求学时，曾经遇到过一位志同道合的美国学者，他们同是研究生物学领域，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两人思想交流屡屡碰撞出绚烂的火花。最让高老先生印象深刻的是二人临别时，同道的一句赠语：“无论做什么都要力争第一，因为人们永远只记得第一的成就，而不会去关注第二”，这句话被高老先生奉为知己之言，更是如珍宝一般传授给学生。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的大气魄让高老先生屡创个人与团队/国家的佳绩，在中国生物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高老先生在研究上更是有自己的一番心得。改革开放之后，正值祖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学术科技浪潮爆发。随着仪器进步，理论成熟，生物学领域更是呈井喷式发展，重大发现接二连三，而不变的正是他们那一代科研工作者们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不断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前进。高老先生认为，大多数重大科研成就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通过

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不断探索才奠基成就。只有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再提出问题的循环中，科研工作者们才能不断深入挖掘，一窥问题的本质可能。想要在快速的研究动态中，掌握最前沿的学术发展，与个人的学习探索能力密不可分。而这其中，老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一口流利的英语，扫除了他与国外先进研究之间的障碍。当年老先生为了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自己抱着厚厚的英语大字典埋头啃读，遇到许多专业术语都是借助字典解读。时至90高龄的老人在闲暇之余仍然勤耕不辍，时常关注全球生物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更新自己的基础知识储备，更是关注祖国下一代青年人的成长。

对心爱的人讲心爱的事

在高翼之老教授这一生中，不得不提的一部分便是讲台三尺余，桃李四十载的教学生涯。“我最喜欢两个地方，一是实验室，二是教室。因为这

两个地方都没有失败。”老先生如是说，“和最心爱的人讲最心爱的事情，就算犯错误又怎么能算失败呢？”老先生一生笃定生物学、遗传学，学术研究便是心爱之事，对最爱的有如朋友一般的同学们讲述心爱之事，大抵也是如鱼得水，好不快活。有了干一行而爱一行的心性，做什么事又能做不好呢？老先生回忆教书经历，曾有一得意门生，课上掐表计时，对照课程内容比重安排，惊觉先生讲课行云流水，布局得当而严丝合缝，课后大赞先生备课充分，内容切实。谁知先生只不过课上随性而谈，不曾刻意分配时间。学术之精，传授知识也变成水到渠成。另有一次课上，幻灯片展示了一次实验的跑胶结果，有同学心细如发，发现 marker 总长有误，便直言指出。老先生自然欣喜接受，与我们谈起时，大赞师生交流的经历。曾有教育局听高翼之教授课后，给出“多少年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课了”的评价，教书育人，载德载行，为祖国的

新一代研究学者培养生力军。时至今日，高老先生仍然怀念当年与学生们共同探讨问题的情谊，更是怀念那段师生其乐融融不断进取的时光。

人们选择职业并且奋斗终生，但又有几人能将事业称作“最心爱的事情”呢？我们询问老先生工作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和挫折，先生回忆良久，最后有些抱歉地告诉我们并不记得了，或许是对工作极大的热爱，才能把这几十年如一日变得只有美好回忆，任何困难都不叫困难吧。无论是对祖国，还是个人价值的践行，把它变成最心爱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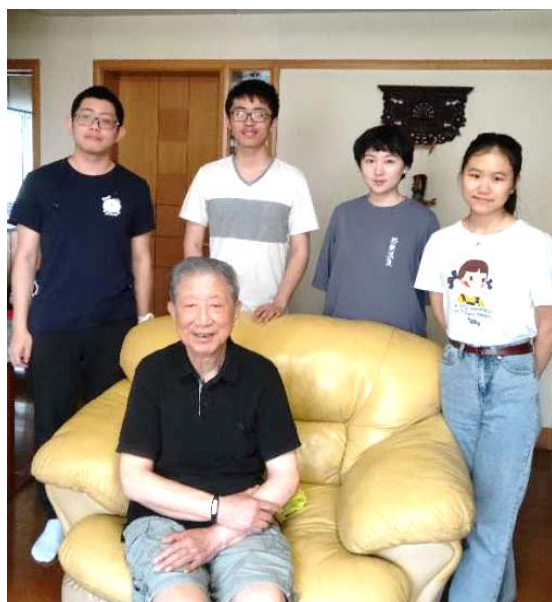
广泛涉猎，厚积薄发

高老始终强调我们青年学生应该涉猎广泛，这对青少年今后的路大有裨益，对祖国的丰富美好未来更是有强大的助力作用。的确，从高老卓绝的学术成就中，我们就能看出丰富扎实的知识对成功的重要性。作为我国遗传学的一代宗师，高老可不只局限

于自己的专业，而是发散性地将遗传学、分子细胞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进行了DMD家系的Bayes分析和RFLP连锁分析，并一举发表在英文刊物上，在当时刚刚对外开放的新时期，教学科研条件相对落后，大众思想相对闭塞，知识面绝对匮乏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需要大胆识大智慧的想法，这是需要将诸多领域联合应用的研究，其创举已经超越我们现今许多SCI论文不知凡几。拿高老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做研究就要在规矩严谨中求变，就要想人之不敢想，做人之不敢做。诚然，一味的模仿和参照前人的经验是学习的过程，但是永远无法做出自己独有的东西的。

而当论及研究过程中是否遇到跨学科困难时，高老笑着回答道“因为以前的基础扎实，涉猎广泛，整个研究过程都是轻松快乐的”。虽然这可能被当作一句玩笑话，却是一句真切的实话。外人看到的往往总是高老先生卓越的成就，却不知道老先生为了

坚持自己一辈子的生物学梦想，在大学期间就辅修了多门相关的医学人文课程，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即使参军之后，仍然没有放下对自己的要求，寻求一切机会填充自己。一抓到空余的训练时间，高老先生就沉浸在自己的生物学世界中，通过自



学厚重的生物学书籍，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了学术方面，高老丰富的知识面还为他的职业与生活带来了便利与乐趣。在他刚刚入伍时，部队需要开设教学关于飞机材料的相关知识的课程，而教学组织者本身对有机化学领域却也一知半解。一筹莫展之时，是高老凭借着自己大学学习的基础，在



不借助任何参考书的艰苦条件下，独自编纂了有机化学的教材。“基础窄的人是一定不会成功的，知识了解的越宽越好，要宽到你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高老常这样叮嘱门生。

兴趣丰富，认真钻研

如今高老已经退休，但他的退休生活仍然是多姿多彩，而这都得益于他丰富的兴趣爱好以及认真钻研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高老的一颗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赤子之心。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虽为理科生，但是高老选修了

许多自己感兴趣的文科内容，也因此接触到了许多传统文化知识，外国文学知识，对昆曲痴之若狂，其喜爱程度，不亚于当代年轻人的追星热度。如此看来，科研工作者也是有血有肉活泼可爱的普通人了。

高老除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还紧跟时尚潮流。高老对智能手机、微博微信使用得心应手，通过微博这个广阔的平台和许多昆曲名宿以及其他昆曲爱好者们交流彼此心得，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高老的微博上看到许多有关昆曲的内容，查阅到

高老所写的数量众多的有关昆曲的文章。2019的5月18日高老参加了在苏州举办的中国昆曲博物馆捐赠活动，旨在为我国博大精深的昆曲文化传承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高老知道昆曲是自己的爱好，更是中华千年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曲值得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更需要有一批爱它像高老这样的人去传承昆曲精魂。而更让我们钦佩的是高老对一项爱好的钻研精神。

高老的二哥生前写过一本研究儒家文化的书籍，然而还未等到出版便不幸逝世，留下了许多英文版本的手稿遗迹。高老退休之后继承了兄长的遗稿，又对儒家文化产生了兴趣，也为了却兄长心愿，认真钻研了相关古籍以及专业文献，查阅许多权威儒家

典籍，将其二哥遗留的英文原稿全部翻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后又被国家出版总署选中得以在越南、韩国、美国传播推广。

本是专业以外的事，做出的水平确是专业以上。描述这段经历时，我们能从高老的语气中感受到其中洋溢的热情。而让我们感触颇深的是高老对自己兴趣爱好的钻研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自己专业钻研程度，也难怪高老既能取得卓越的学术成果，也能享受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

信步人生书华章，高老先生之谓也。

(编辑：王天晴 张宁悦)

醉心中医六十载 悬壶济世为良医

——窦国祥教授访谈录

李瑞祺 刘 焱 陈泽欣 王家杰

他，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江苏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他，曾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肾病、免疫病专业副主任委员，营养食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临床擅长诊治内科疾病，包

括心血管病、肾病及脾胃病，应用药食并治方法，给予患者指导。

他，就是窦国祥教授。东南大学医学院（原南京铁道医学院）1963 届校友。

“三珍惜”

珍惜生命，捍卫生命



珍惜崇高职业，贡献毕生精力
珍惜时间，有规划，脚踏实地

1958年，窦国祥教授高中毕业，本因政治原因等未能被高校录取，但机缘巧合下被当时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补招录取，走向了医学的道路。据窦国祥教授回忆，当时与他同时入校的同学中，大多与他情况相似，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校期间，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努力，试图利用好在学校

他们那一代铁医人能取得后来的成就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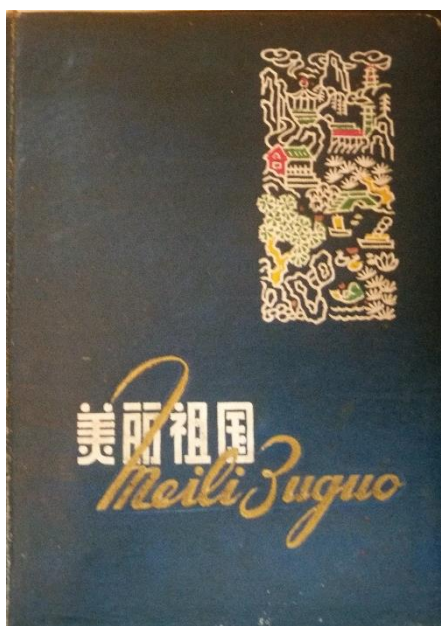
同样，作为医者，作为医学生，生命是与我们的职业息息相关的词，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努力地去珍惜好捍卫好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没有一个崇高生命观，崇高职业感的医生是成为不了一个好医生的”，窦国祥教授如是说。



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他想，这也是

同时作为一名医学生来说，学习医学的时间是漫长的，从一个医学生

成长成为一名医生的道路也是漫长的，虽然时间很长，但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规划自己的时间，珍惜好利用好自己时间。谈到这里，窦国祥教授也是举起了自己的例子，他在医学生的生涯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运动，几乎就只有学习。离学校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商业街，他一年仅仅只去过不到两次。也正是这一分一秒的努力，踏踏实实地向前，才铸就了今天的成功。我们有幸在窦教授的家中见到了他求学时的笔记以及手稿等等，应该说其笔记的手稿的清晰度和工整度，逻辑性让时隔几十年的我们依然是赞叹不已。



“四学会”

学会学习方法、学会理论结合实践

学会善于总结、学会生活

在与窦老的对话中，他给我们总结了他的一些学习经验，简单地概括就是“四学会”——学会学习方法、学会理论结合实践、学会善于总结、学会生活。“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学习方法”窦老如是说道。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特殊的学习氛围，在他们那个年代，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是一件来之不易十分珍贵的事情，所以窦老以及他的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那个时候同学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学习模式——“三个环节，一个互助”。三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功课预习了没有，这个书你看了没有；第二个，上课你听了没有；第三个，下课了以后，你复习了没有，复习了以后有没有整理你自己的笔记，而不是老师的笔记。这个是每天要做

的。一个星期以后，周末的时候就把整个星期再回顾一下，采取一对一、一帮一的形式来复习。“这样子的话，就每个星期每个月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你完成了本来的功课以后，才有机会到图书馆去”。窦老回忆起那时的学习生活整个人都是轻松而愉悦的。窦老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学好的关键就是你同学之间必须要互助。“有的时候，他要帮你忙的对不对。你一个人完不成，他可以帮你忙。这个没有关系的，帮忙他不算错误的，而且很团结的，一个学习组的以后都是好朋友。因为碰到什么问题，大家解决。特别是抢救了什么，你一个人搞不过来啊，大家来一起来抢救。”正如窦老所说，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在学生学习时代就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大概也是他不管是学西医还是中医都能做得很好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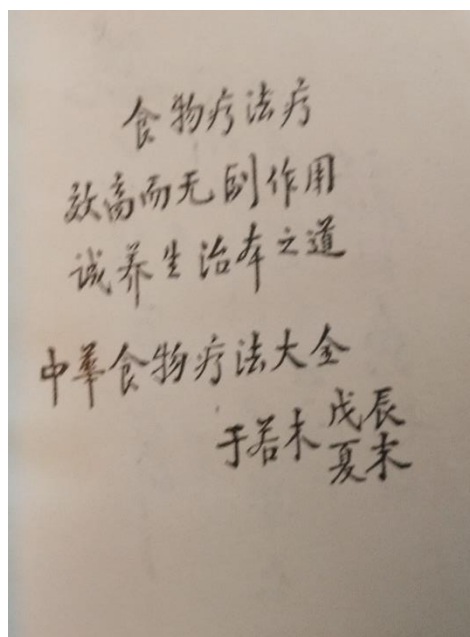
第二个学会就是要学会理论结合实际，通俗点来讲就是要动脑筋结合实际。六零年的时候，恰逢整个中国

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铁道医学院有任务要下乡预防水肿病。但是学校的医生很少，就指派了窦老和他的同学们下乡完成任务。而实际上他们那时才学了两年医，只学了很简单的一些方法，就下乡去了。窦老举了个例子，当时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整个南京、整个江苏，田里都是水虫，没办法劳动。他们同学们当时都学的西医，巧的是窦老当时出于爱好和家庭环境熏陶自己学了一些中医，刚好学了中草药怎么治疗水肿。他们到了兴化以后发现，想要用药物，没有药物；想要用营养，没有营养。吃的东西都没有，怎么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呢。所以当时就采用了同学们想出来的中草药熏蒸疗法。当时就把农民集中在澡堂，澡堂里面放中草药熏蒸，效果非常好，一次可以消水肿十几斤。那时候水肿很厉害，主要是没吃的。但这也不是个办法，隔一个星期又肿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没吃的。他们就开始思考有什么东西是既能够

补充营养的又能够消肿的呢？当时窦老就向当时同组的杨院长提出来，说兴化这个地方，河貌地区，都是水，在各个地方都是坐船的，它没有路的，到这个水里面找一些吃的东西，既可以消肿又补充了营养。所以当时窦老试点了一个东西，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听说过菱蒿跟蝼蛄是消肿的，而他们农村里到处都是。农民们又没吃的，就到处找食物，那个稻草翻开来下面都是。后来就试点，找了几个年纪轻的农民去试点，天天吃，大家惊喜地发现，吃了以后就不肿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植物蛋白的补充，而且这个虫子也可以消肿。所以这个经营好了以后省里都宣传，而那个时候他们那帮同学才二年级多一些。讲到这里窦老感慨道：“所以必须要结合实际。当然我是只举了一个例子啊，假设没这个水肿，我们也没机会出去，也不会去学这个东西，一定要联系实际来学习。”

第三个学会——学会善于总结。

窦老说：“那么我在学生时代养成了这么几个习惯，一个就是要有计划，要珍惜时间，第二个，多动笔、多记和多总结，第三个呢，一定要多看，多看书，多向同学、老师学习。我们自己图书馆不够，我就跑到其他图书馆去，一定要看。”他给我们举了上临床实习时的例子，实习轮转时在内科三个月，每个科，每个小科，心血管半个月，呼吸半个月，神经半个月，内分泌半个月。但是在半个月里面把这里面都学到不可能的，得抓重点，以点代面。比如说消化系统，就得把胃



作为一个重点；心血管系统，得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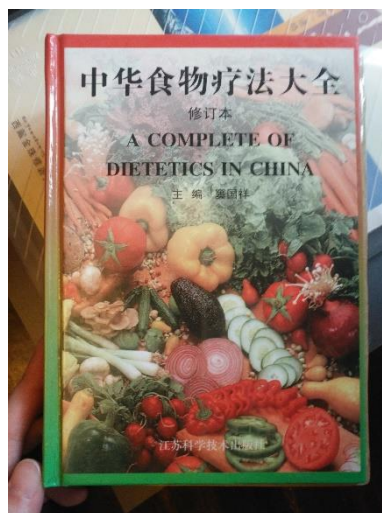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重点。这都是窦老总结出来的宝贵的实习经验。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学会就是学会生活。大抵是受中医的影响，老先生整个人都很平和，也很注重养生和生活，他认为，养生最重要的是6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就是要知变、应变、适变。人要根据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中医特别强调天人相应，根据气候调整生活作息，形成适合自己的“生物钟”。人和，就是要家庭和和睦，和同事、朋友之间宽容相处。窦老认为，锻炼要结合自身情况，他平时锻炼主要就是走路。“我从小体质并不好，所以不剧烈的运动更适合我。”窦老说。闲暇时，窦老爱弹电子琴、钢琴及唱歌，还喜欢画画、写作。多年来，窦国祥为《中大医院集团报》投了十多篇作品，有《十年铸书》、《下放歌声》、《丁家桥情思》系列等，追忆过往、传承历史，体现老一辈医务工作者对工作及生活的热爱。

谈中西医结合与个人选择

窦教授与中医渊源颇深，窦国祥出生在钱门塘的中药世家，世代经营的广春堂药店由曾祖父开办。据嘉定档案馆记载，广春堂始建于1853年清代咸丰年间。到窦国祥出生时，已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

从10岁开始，窦国祥就跟着父亲去田间、竹林采药，经常天一亮就出门。一边采药，父亲就一边向他讲解这些草药的功效。年幼的窦国祥听得



似懂非懂，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枯萎和红彤彤的鸡冠花，父亲告诉他，枯

萎清热止渴、利尿生津，鸡冠花则是凉血止血、止泻止带的良药。

12岁前，窦国祥对中草药也没特殊的兴趣，但12岁时的一次高烧，老中医妙手回春把窦国祥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肚子痛、拉稀，高热一直退不下去，牙齿都烧黑了。”窦国祥回忆道。看过西医未果，命悬一线，就在这个时候，祖父给他找来一名周姓老中医，把过脉，周医生立刻让他服下一剂叫“神犀丹”的中药。数日后窦国祥高烧渐退并且痊愈。对中医莫名的好感自此在他心中萌发。

而工作后，在大内科的几年时间使窦教授发现西医的发展比较机械，而且发展主要集中在外科。内科的发展则是五年一个阶段，且观点比较机械。窦教授举例当他还是住院医生的时候，他们科里的季院长是内科消化科的教授，也是医院的院长。他查房的时候看到一个病人全身肿，心力功能衰竭，需要利尿消肿，用了最有效的利尿药，连进口的药都用了，病人

小便就是不出来，水肿问题解决不了。季院长知道窦教授平时还钻研中医书，便向窦教授询问有没有可行的办法，那个时候窦教授才只是住院医师，窦教授说“你相信我，我就试试看”。窦教授认为病人肾功能不好无法利尿，于是选择了泻，窦教授亲自到山西路中药房给病人包药，亲自给煎药、观察，两小时一次中药。通过肠道泻水，到了半夜以后病人终于消肿，能平卧了。窦教授说道，中医里非常注意肠道消肿。

另外，窦教授又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窦教授认为西医的办法比较程序化，而且相对依赖一些器械，没有了一些器械，就解决不了问题。比如曾经有个病人呼吸衰竭，肺部整个都是痰，呼噜呼噜出不来。医院用吸痰器，拼命地给她吸痰，血都吸出来了，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就去找了窦教授。窦教授告诉我们：“吸没用是因为什么？因为她都是泡沫，泡沫用吸痰器吸不出来。当时用的什么方法呢？”

我就拿着两根筷子，刺激她的咽喉部，让她自己反射性呕吐。在呕吐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痰就出来了，吐到后来一大脸盆。但是人醒了。你假如还用这个吸痰器，你永远救不了她。”

所以这些事情，在窦教授当医生的时候，让窦教授感觉西医有局限性，没有任何一种医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另一个环境因素，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窦教授在内科工作，由于背景原因被停止工作，窦教授觉得不能浪费时间，于是就开始钻研中医，后来又被派出去到中医药大学学了一年中医。因此在自身对中医的兴趣与渊

源加上环境的因素使得窦教授做出来由西医转中医的重大选择。但窦教授同时也认为西医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很多西医观点跟中医是相近的，他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最佳的选择。

巴普洛夫说过，青年人，一是要循序渐进，二是要谦虚，三是要有热情。我想，这也是窦教授想带给我们的东西。

醉心中医六十载 悬壶济世为良医！他，就是窦国祥教授。

（编辑：李嘉伟 张宁悦）



《医路历程》参与人员合影留念

万理林 姜添铖 阮亮 王溥丰 李建平 李嘉伟 吕振港 赵猛 王家奇 陈泽欣 李瑞祺 杜天
杨雯迪 陈文雅 刘丽萍 史楠 张玲 王焯 江雨昕 孙若语 毛倩倩 田甜 吉欣 张宁悦 李松栗 黄淳淳 田宇嘉 曹鑫
周兰兰 石然 刘岐山 谭东伟 周明阳 罗萍 王天诺 陆珈怡
杨钧岚 顾倩
管佳恒 常婧瑶



责任编辑：杨雯迪 曹 鑫

封面设计：王 焱

版式设计：张宁悦 李嘉伟
俞蒋锴 王天晴



欢迎关注
东南大学医学院
官方微信